

运河

南端

CANAL · SOUTH

2

AUG. 2016

VOL.1 NO.2

总第2期·季刊

名家名篇：
中国运河文化及其遗产保护

运河故事：
天下粮仓富义仓

扬州行
遗韵悠悠在木渎



智慧一点通



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16:00

16:20

1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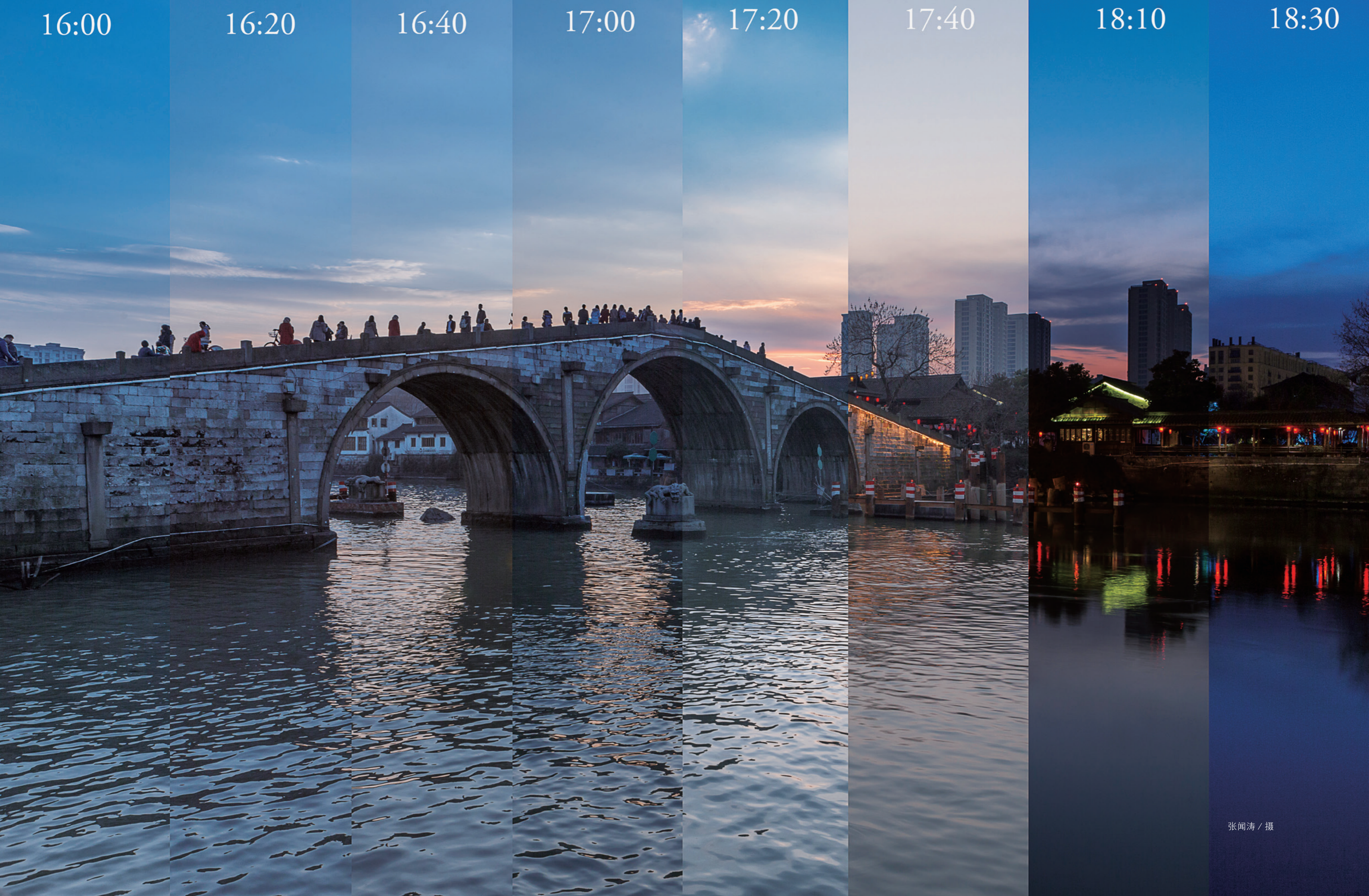
17:00

17:20

17:40

18:10

18:30





2
Aug. 2016
VOL.1 NO.2
总第 2 期
季刊

“枕水人家”运河情

撰文 | 王水法

如果把长城比作中华民族的脊梁，那么大运河便是神州大地的一条大动脉。它流淌的是生命之水，承载的是梦想之舟，寄托的是精神归宿，象征的是母亲之河。在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我为此创作了一首歌：有一条古老而神奇的长河，那是我们的祖先用双手开拓，蜿蜒南北千里水，浇灌东西万顷禾，大地是母亲宽广的胸怀，河水像乳汁深情地流，天下粮仓，恩泽神州，传唱着生生不息的歌……

杭州作为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是一座典型的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因河而名的城市。运河水系与市河水网巧妙相连，融为一体，衍生出独特的依河而居、枕水而眠的运河文化。这种“一水穿城过，两岸百业兴”的城河格局，让世代生活于此的“运河人家”与千年古运河结下了深深的恋河情结。

如今的小河直街，商铺林立，顾客盈门，游人如织，重现昔日滨水商街的繁华景象；桥西街区入驻了方回春堂、杏林国手、天禄堂、名医馆，那种“望闻问切”的画面，构成了江南水乡的又一道靓丽风景线；大兜路上的茶餐会所、私房菜馆、风味小吃，清香迷人，撩人占席，为“吃货”们凭添了几分惬意。

漫步运河岸边，或乘坐舫舫之中，不经意地穿越时空，触摸历史，感受文化，即使是一尊雕塑，一个小品，一棵古树，一盏明灯，一朵小花，每每都有一串美丽的故事，一组时代的信息，一幕惊喜的感动，永远驻留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若捧一本《运河·南端》杂志在手，那定会帮助我们对博大精深的运河文化有更深更透的解读，从而更激发起人们对运河的眷恋和与杭州这座城市幸福地相拥相守的热情。

主管：杭州市拱墅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体育局）
主办：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编委会主任：黄玲
编委会副主任：刘德龙 陈展 戴丽群
编委：陈琳 阮利平 陆菁 沈丽红
文闻 黄莹 许赞 焦明
杨芳 夏菡茜 张建青 孙辰霏
刘黎明 乔国良 吕英娟

主编：叶艳萍
执行：陶林
责编：周佳
设计：杭州解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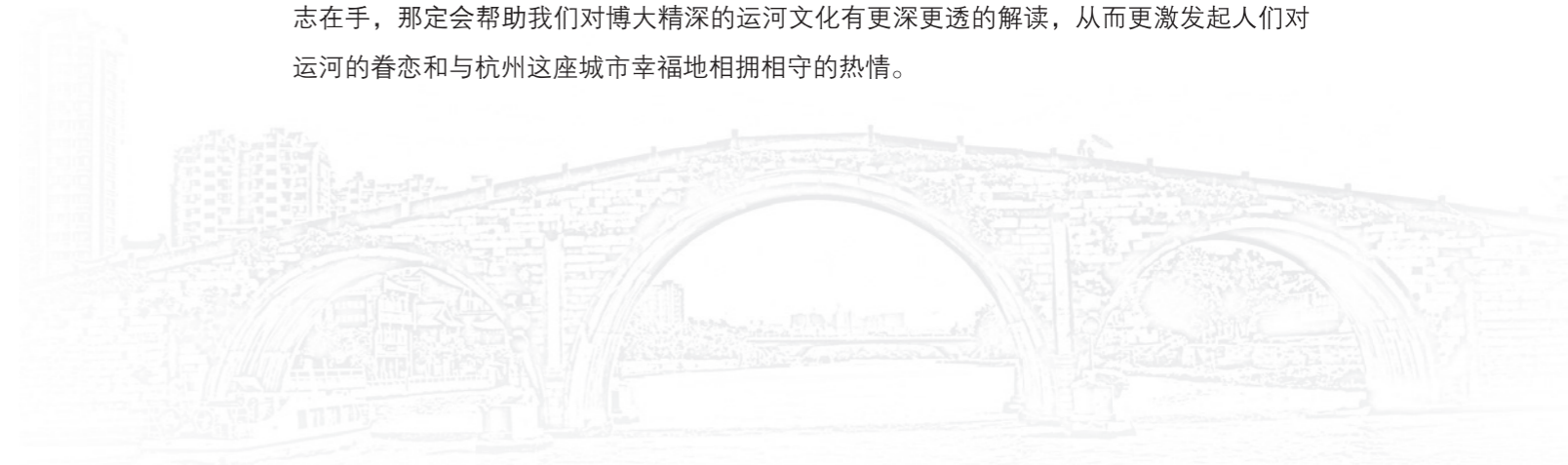
编辑部地址：杭州市拱墅区运河文化广场1号
邮编：310015
投稿邮箱：276476005@qq.com
电话：0571-88162078



智慧一点通



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目 录

卷首语

01 “枕水人家”运河情 - 王水法

名家名篇

04 中国运河文化及其遗产保护(上) - 李 泉

运河故事

18 天下粮仓富义仓 - 陶 林

24 大运河开拓者 - 周 游

29 凤山烟雨 - 高建和 金为民

33 大运河放筏 - 高同先

运河风情

36 扬州行 - 刘黎明

38 遗韵悠悠在木渎 - 葛冬梅

运河史话

44 运河功臣郭守敬 - 崔建利 王欣妮

49 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水神” - 胡梦飞

53 千年沉浮大运河 - 周 佳

运河遗存

58 明代北新关 - 焦 明

62 清代苏州府官舫 - 夏菡萏

八面来风

66 清风涤尘 利剑惩腐

68 运河颂红船·书画忆长征

69 新书《天堂流过一条河》举行首发仪式

70 《遇见大运河》从杭州舞到北京

71 纪录片《国之大运》正式启动

72 北京大运河临时邮局亮相什刹海畔

73 扬州开通京杭大运河旅游专线

74 380多岁的拱宸桥,启动首次水下体检

76 巴拿马运河扩建后通航

77 喜迎 G20 文明我先行

封三 运河文化沙龙体验点

名家名篇

MASTERPIECE



运河文化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它的内涵不尽相同。



中国运河文化及其遗产保护（上）

撰文 | 李 泉

李泉，男，1949年生，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运河文化是运河区域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南北地域跨度大、时间积累长、内容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是特定文化区域中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文化区域是她的母体和载体。区域文化又是历史文化的层层积累，文化历程是她的血肉和精髓。就是说，当某一地理区域的文化积累相当丰厚，出现了区域内部物质文化的共性和精神文化的认同，这种共性和认同明显区别于相邻的同属于一个文化大系的其他区域文化，于是新的文化区域出现，新的区域文化也形成了。运河文化就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

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文化特质又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区域文化。2007年9月，中国大运河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在扬州揭牌，运河沿线的33个城市组成城市联盟，共同承担这项任务。经过7年的努力，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本文简要论述运河文化的形成过程，并对运河文化遗产的特点及其保护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早期的运河及运河文化

自春秋后期至隋以前的千余年时间里，中





国境内见于文献记载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运河不下二三十条^[1]。有春秋后期吴王夫差开挖的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沟通沂水和济水的菏水^[2]，有战国时期魏惠王开挖的鸿沟，秦始皇时开挖的举世闻名的灵渠。汉武帝开挖的从长安

沿渭水南岸东行出华阴入黄河的“漕渠”，是关中地区的重要运河。东汉一代极力修治经营汴渠（即鸿沟水系的汴水，又称获水）。东汉末年，曹操向北方用兵，在黄河以北开挖了利漕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沟通了

黄河与海河。曹魏末年又在今豫东皖北一带开广漕渠、淮阳渠和百尺渠。孙吴曾对镇江至丹阳段运河进行了修治。西晋对邗沟进行了改造，使之径直南流入淮。东晋荀羨北征前燕时开泲河引汶水通于泗水，桓温的部将毛穆之在钜野开河百余里。这些运河覆盖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北起河北北部，南到广西，西达关中地区，东至苏鲁沿海的广大地区。

有了运河就有了运河文化，这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普遍认可但却不能成立的命题。运河文化是运河流经地区的区域文化，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区域文化是一个文化时空概念，它的生成，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是地理环境，也就是一个具有凝聚性、开放性且相对稳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这是空间概念；另一个是历史演进，也就是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的逐步积淀，这是一个时间概念。具备了形成区域文化的地理空间，又经过较长历史时段同质文化的积累，取得了区域成员的文化归属和文化认同感，区域文化的生成才有了可能。但是早期运河区域还不具备区域文化生成的基本条件，没有经历文化积累的必要过程。

就地理环境看，运河开挖以后，形成了以运河为轴心的向两岸扩展的自然地理区域。但是，早期运河的开挖规格低，功能单一，里程不长，短者数十里，长者数百里，没有形成一个水运系统，运河的辐射力局限于运河两岸狭小的地域内。而且，这些长度有限的运河，大都处在某个诸侯国或某一行政区域中，面积狭小的运河区域，莫不包含在以诸侯国或行政区域为基础而形成的文化区域之中，无法突破源

文化对它的影响和控制，无法与其他文化区域的异质文化交汇碰撞而形成独特的文化地理环境，所以无法形成与所在的或周边的其他区域文化形态明显不同的文化特征。

就历史演进看，早期运河大都是为运送军粮和军事物资而开挖，一旦战争结束或战争形势发生变化，运河的使命完成，它便成了无人关注的水沟，淤塞湮阻，无法通航，有的数十百年后又被挖通，有的则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在较短的历史时段或前后不相衔接的几个时段内，某一条运河流经的区域可以形成特点显明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但却难以孕育出区别于其他文化区域的精神文化成果，形成独具一格的观念文化形态。决定区域文化品格的精神文化是区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行为文化升华结晶的产物，是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变异、层层累积并被区域民众所认同的文化状态。在隋代以前，这种精神文化形态在运河流经的区域中正在孕育，还没完成规定区域文化性质的升华。

当然，这个时期，也有首尾连接、里程较长的运河，如曹操向北方用兵时所开挖的运河，起于今河南省淇县一带的黄河北岸，一直向北延伸进入今河北省东北部的滦河，到达唐山市以东的地方，全长千余里。但这条运河贯通的时间很短，除白沟之外，曹操北征的战争结束后，其他河段便相继湮塞了，没有历史文化的积淀。这个时期，也有在很长时期内保持通航的运河河道，如吴王夫差开挖的邗沟、秦始皇开挖的灵渠，后代不断维护修治，生生不息，流淌至今。但是这些河道里程都不长，蜗居于以诸侯国或



行政区域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区域之中，时时受着它所归属的本土区域文化的浸润滋养，无法形成有别于周围文化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形态。

与前一时期的运河相比，隋代以后运河河道的走向趋于稳定，连续通航的河道里程大大延长，持续通航的时间更久，运河开挖、维护、通航、管理技术有了明显提高。隋炀帝所开大运河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等首尾相连的4条运河组成，加上隋文帝在关中所挖的广通渠，全长2700多公里，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唐代汴渠（即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成为漕运

动脉，时时予以培护修治，通航条件较隋代有较大改善。北宋十分重视对汴河的修治管理，两宋对邗沟、江南运河，也多次进行整修治理。金朝在北方兴建了一些新的引水工程，保证了御河的畅通。以上河道流向历经几个朝代无大变化，连续通航达数百年之久。元代开挖会通河，北方运河弃弓走弦，河道走向有所改变，但卫河（南运河）、潞河（北运河），特别是淮海以南的邗沟及江南运河，仍利用了原来的河道。历朝政府对运河的修治维护、河道的长期畅通、运河流经地区间的长期经济文化交流，由运河交通而带来的异地文化的传入及与本土源文化



的融汇碰撞，使运河区域与周边的其他区域产生了文化上的差异，运河文化区域由此形成了。

运河文化区域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运河的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前一个时期，战争的需要是开挖运河的动因，运河的主要功能是运送军粮及军事物资，多属临时性的军事通道，设计较为仓促，开挖时因陋就简，一旦战争结束，某些河段的使命就已完成，因缺乏维护而淤塞。汉代以后，运河也承担了漕运的任务，但西汉建都关中，当时的农业区在中原及黄河下游地区，西汉漕运路线为东西走向，最重要的漕运水道是黄河。东汉都城东移至中原地区，京城物资供应的压力较前减小，对漕运的依赖有所减弱。魏晋分裂割据时期，运河漕运的功能明显蜕化。隋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移至东南地区，由东部及东南地区向都城漕运粮食及其他物资，成了统治集团生存和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保障，成了一项持久的不可间断的经济活动。“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3]，历代政府无不将其列为重要政务，而漕运河道的开挖、修治、维护也格外受到重视。唐代于工部下置水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津济、船舳、堤堰、沟洫、渔捕、运漕、碾硙之事”，京城附近设有“渠长”“斗门长”，各州县的堤堰，由刺史、县令负责管理^[4]。宋承袭唐制置水部郎中、员外郎，“掌沟洫、津梁、舟楫、漕运之事”，同时在三司下置河渠司，专门管理“黄汴等河堤功料事”，后改置都水监，下置“提举汴河堤岸司”等官职^[5]，专门管理运河河道事务。运河及漕运管理的法规制度逐步建立了起来。运河区域的地理空间大大拓展，长期通航而积累的历史文化也逐步丰厚了起来。





张闻涛 / 摄

随着运河运输能力的提高，运河所承载的商品流通的功能逐步彰显出来。隋唐时期，除了关中运河最西部的京城长安、京杭运河中部的东都洛阳之外，地处江南的运河城市杭州、苏州、湖州、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邗沟南端的扬州、北端的楚州（今江苏淮安），汴水流域的开封、宋州（今河南商丘），永济渠流域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都是商业繁华的城市。城市之外，还出现了专门进行商品交易的“草市”。唐代诗人王建《汴路即事》诗曰：“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

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运河千里流淌，两岸槐树成行。远来的客商都从这条河道上经过，不同的语言说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河边的草市里商贩争相购买由江中运来的货物，津桥旁边的关卡对泛海而来的商品征税。这是对运河区域商业及商业文化的形象描述。北宋时期的运河中心城市东都开封，南宋时期的都城运河南部城市临安，元代运河北端的城市大都，都是商业繁华的城市。此外，运河沿线的徐州、扬州、镇江、真州（今江苏仪征）、建

康（今江苏南京）、常州、无锡、吴江、湖州、嘉兴、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城市的商业也十分繁荣。商业繁荣带来的不仅仅是运河区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商业文化的交流，生活理念及价值观念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为运河文化区域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因运河畅通而引发的南方与北方间的文化交流，对运河文化区域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隋炀帝巡游扬州，随行人员除后宫、诸王、百官外，尚有僧尼、道士及外国客人，列船数千艘，挽船夫 8 万余人，船队绵延 200 多里，旌旗飘扬，华光溢彩，一路悠悠行进，历时两三个月才到达了江都。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关注隋炀帝恣意享乐、滥用民力的荒唐行为，而是从另外的角度审视这件事，就会发现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次南北之间的规模宏大的政治、文化、礼仪、习俗的大传播、大交流。唐代，全国各地的官员、士人、学者、商人、工匠、艺人、僧侣、道士及国外使节、商侣人等，无不往来于运河上，或从南方的杭州及苏州、扬州等地北赴洛阳至京城，或者从京城至洛阳经运河到达南方各地。他们沿途办理公务、驻足游历、访朋会友、说经布道、求师问学、传播技艺、购买商品、娱乐消费，将各地的文化乃至异域的文化——生产技术、生活方式、观念、信仰、风俗、习惯等等带到了并播撒在运河区域。运河区域的本土文化、源文化逐渐发生变异，产生了不同于周边地区的新的文化形态，形成了与区域源文化并列的同属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的亚文化。

隋唐宋元时期的运河文化还没有达到十分成熟的程度。这个时期，运河的通航常常受到战乱及国家分裂等政治形势的干扰，运河的许多河段处于时通时塞的状况。汴河是京杭运河水系中最重要的一段河道，安史之乱发生后遭到破坏，代宗广德年间，刘晏予以修治，恢复了通航。唐后期，藩镇割据，时常断绝交通，汴渠最终淤塞。五代周世宗复加治理，使之畅通，北宋极力经营，精心培护，但好景不长，北宋中期以后国势贫衰，黄河泛滥，泥沙淤积，至金朝，完全堙塞废弃。南宋人韩元吉行经运河时有诗曰：“东海桑田未可期，隋河高岸已锄犁。楼船锦缆知无地，枯柳黄尘但古堤”^[6]，北宋时水流奔腾的汴河，南宋时已干涸成为农田。元朝另辟水道，汴河遂成历史陈迹。河道通塞不定，使其流域的文化积淀时断时续，往往是新的文化形态刚刚萌生，就被政治军事风雨摧折，文化积累的连续性受到影响，大大减缓了新文化形态生成的速度。黄河以北的运河河道所受的破坏比汴河小些，但隋唐到北宋，其主要功能在于向北部边地运输军事物资，漕运及商运都不发达，人员往来少，与其他区域的文化交流少，也使得运河区域文化未能达到成熟的程度。

元代运河全线贯通，但它的设计存在不少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会通河水源分配不合理，汶河水源自济宁输入，使得北段水量不足。“济宁地势，北高而南下，故水之往南也易，而往北也难，北运每虞其浅阻”^[7]。此外，新开运河河道规格偏低，“岸狭水浅，不能重载”^[8]。加上黄河决口，侵淤运河；社会动荡，经济凋敝。通过运河运至大都的漕粮每年最多不过

二三十万石，不及漕粮总量的十分之一。元朝国祚不久，运河通航时间短暂，所以京杭运河虽然全线贯通，运河文化还只是在某些河段不断发展，贯穿南北的京杭运河文化区还没有最终定型，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之亚文化的运河文化形态还处在萌生或初步形成的阶段上。

二、明清时期运河文化的兴盛

明清两代以漕运为军国大计，视漕运为国家命脉，对元代运河河道设施等进行治理改造，使河道走向、规划合理，水量相对充足，疏浚培护及时，管理制度完善，四五百年间，京杭运河河道稳定，持续畅通，它所流经的地区（流经的城镇和州县）及其辐射的区域（距离运河较近且明显受到运河交通、运河经济影响的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纵贯南北，穿越几个行政区域、自然区域的地位特殊、特点鲜明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不仅有数百年前后传承的与其他区域明显不同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而且漕运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区域内外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人口的迁移流动等等，更使这个区域逐渐融汇积累了丰厚的精神文化。绚烂多彩的京杭运河文化进入了空前兴盛的阶段。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区域出现了特点鲜明的物质文化。有穿越数省的运河主河道及引水减水河道，有难以计数的水工设施、管理设施和其他配套设施。其中仅水工设施就有如下几类：一是综合性枢纽工程，有南旺分水工程、黄淮运交汇的清口工程、运河入江工程等。二是供水工程，包括引水工程，如引汶泗济运河道、



张闻涛 / 摄

引黄济运渠道、引漳入卫河道等；蓄水工程，如会通河水柜、苏北骆马湖、江南练湖等；泉源，如分布在鲁西 16 个州县的会通河泉源（康熙年间达 400 多个）、北京西山诸泉等。三是排水工程，包括北运河、南运河及会通河北段诸减水河、减水坝、减水闸等，里运河减水河、减水闸等。四是控水工程，包括数量众多的船闸，河堤湖堤，各种功能和材质的坝，绕闸而过的月河。五是交通工程，包括桥梁（南方的石桥及北方闸桥一体工桥梁）、渡口（如瓜洲古渡）、码头、纤道等，其总量当以百千计。

运河沿线的工商业城镇也是运河物质文化

的一个亮点。运河像一个环环相扣的经济链条，在它的每个环节上，都有商业繁华的城镇作轴心，将沿途乡村紧紧地连为一体；运河又是一个动力源，持续不断地通过城镇经济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兴盛。北京、通州、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淮安、扬州、镇江、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且不说，仅船闸、码头、渡口处兴起的小城镇，也足以使运河城镇文化突显出异样的色彩。在济宁至聊城一百余公里的河道上，自南向北便有安居、长沟、南旺、开河、袁口、靳口、安山、戴庙、张秋、七级、阿城、李海务、周店等 10

余个商业繁华的小城镇，它们大都是夹河而建，商业兴盛，交通便捷，运河泊来的南北各地商品由此转卖向附近村镇，同时也向运河商船输入附近城镇乡村的农产品。运河区域城镇格局及城镇经济特点构成了运河物质文化的显明特色。

明清政府均设有中央派驻地方的从事河道管理的高级官职，地方政府也有专职官员从事河道管理，管理河道的差役河夫也逐渐趋于专业化。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疏浚河道、修筑堤防；启闭船闸、节制水流；管理泉源、输水供水。明清时期还有管理漕粮和漕运的专门官职及相应的下属机构，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监督、催促漕粮的征收；管理运河沿岸的粮仓；管理漕船运输。为了保证漕粮运输安全准时，明清政府制定了许多法规条例，内容包括漕粮开仓兑运

的时限，各地区漕船的行驶次序，各河段的行驶速度，抵达通州的时限，漕粮短缺的赔偿，漕船夹带土宜的数量及种种漕运禁令。这些法规条例对运河沿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另外，从事河道、工程、漕运、仓储、税收管理的官员常住于运河沿线的大小城镇，十几万漕运兵丁每年往来于运河上，数以万计、十万计的民工几乎年年从事运河堤防修筑、河道疏浚、闸坝建设，难以计数的农民离开农村到运河城镇码头船闸从事拉纤、搬运、商业、餐饮、服务等行业，从根本上改变了运河区域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使运河区域出现炯异于周边其他地区的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

（下转第三期杂志）

运河故事

CANAL STORY



天下粮仓富义仓
大运河开拓者
凤山烟雨
大运河放筏

注释：

[1] 本文论述中国的运河自春秋时期夫差开邗沟始，至于许多学者所讨论的吴太伯所开太伯渎、宋王偃开陈蔡运河、吴、越等国所开运河，因系后代文献记载，多具传说性质，故未述及。

[2] 《国语·吴语》：“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伍子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闾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商”指宋国的都城商丘一带，“鲁”指鲁国都城曲阜一带，夫差所开挖的这条深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菏水。

[3] 康有为著：《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4页。

[4] 参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2页。

[5] 关于宋代运河及漕运管理机构设置情况，详见【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六十三《职官》三、卷一百六十三《职官》五。

[6] 【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六。

[7] 【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一《运河总论》。

[8]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宋礼传》。



天下粮仓富义仓

撰文 | 陶林

2016年

李名节第一次见杨小青是两年前。在富义仓的一个文创工作室，李名节去看单位的设计样稿，设计师就是杨小青。李名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工作室所在的富义仓，典型的古代四合院建筑，粉墙黛瓦，廊檐立柱，庭院深深，既宁静又神秘。因为是工作场合，李名节并没有太多关注杨小青，只是觉得杨小青的设计思路很明确，她讲解得也很简洁、清楚，就和大多数设计师习惯用图像来阐述自己的理念而不是用语言一样。

看好样稿时突然下起雨来，江南的雨就是这样，说来就来。李名节走到门口有些犯愁，他没带雨伞。杨小青看到了，递给他一把伞，那是一把折叠伞，很完美地收拢着，一丝不苟，就和刚从店里买来一样。当李名节从杨小青那只白晰的手中接过伞时，他想：到底是设计师，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

并没有小说中的特意借书还书的故事。几次工作接触下来，李名节对杨小青产生了好感，或者说对富义仓产生了好感。富义仓就是一段历史，就是古代的大户人家，杨小青就是大家闺秀，有良好的教养，有江南女子的婉约和灵气，这对于农村出身的李名节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就如同大雪茫茫的枝头一枚红红的柿子，对于饥肠辘辘的小鸟一样。

最后一次完成校稿，是一个夏日，下班时间，还有一点斜斜的太阳照进富义仓这个四合院里。院子盆景里的荷花开得正红，展示无限生机。四合院里有一个咖啡店，李名节请杨小青在那吃晚饭，杨小青带着李名节在这个久负盛名的建筑里参观韵和书院，参观悦庐茶道，讲解富义仓的来历和故事。

富义仓建于光绪六年(1880年)，取名“以仁致富，和则义达”之意，与北京的南新仓并称为“天下粮仓”。富义仓内共有80间粮仓，每间约20平方米，可存四五万石谷物。门厅坐北朝南，占地面积十亩，原有仓库、砻场、碓房、司事房等。主仓东西相向而建，四列三进。这里曾是杭州百姓最主要的粮食供应地，也是江南谷米的集散地，当年的朝廷贡粮也是从这里开始北运。

从那以后，李名节对富义仓的情感愈加深厚，来这个四合院成了李名节每天的必修课——来接杨小青下班。然后他们沿着古运河的游步道往拱宸桥走，一路上听着运河边的歌声缭绕，看着运河灯影摇曳，感受运河清风拂面。有时候杨小青加班很迟了，他们就在富义仓旁边的胜利河美食街吃宵夜，那里永远都是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与一步之遥宁静的富义仓形成鲜明的对比。

两年后，李名节和杨小青订婚了，他们的婚纱照就选择在富义仓拍摄，是那种中式的服装，红红的唐装点缀在古朴的建筑群中很醒目，也很和谐。李名节告诉杨小青，儿子的名字也取好了，就叫李满仓。李名节甚至想把婚宴也摆在富义仓的院子里，让亲朋好友、街坊邻里体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

1880年

说到富义仓，必须说到谭钟麟。他是民国大佬谭延闿之父。谭钟麟还有另一个儿子，名叫谭泽闿，是个书法家。历史上对这父子三人曾有概言：“一门二进士、两代三书家”。关于谭钟麟的名字，据说有这么一个笑话，他最初叫谭二监，有人



戏称：“呀呀，你叫谭二监，那你哥哥的名字肯定是谭太监了。”他听了之后，便把名字改为钟麟。谭钟麟为官颇有政声，他曾两次到杭州做官。第一次在同治五年（1866年），任杭州知府。第二次是光绪五年（1879年），任浙江巡抚。

杭城历史上有过许多粮仓，比如江涨桥东北的仁和仓，广安新桥旁的广积仓，宝善桥西的永济仓，城内义仓等。每年进入杭城的大米多至数百万斛。但咸丰十年至十一年（1860年-1861年），太平军两次攻打杭州城，清军大败，至太平军撤出杭城后，杭州的仓廩几乎成了空仓。到光绪五年（1879年），杭州城内唯有永济仓、义仓尚有一些储粮。

谭钟麟到杭州履任时，正是光绪五年冬天。那时的杭州，百业凋敝，民生困苦，吏治腐败。谭钟麟甫一到任，就开始整顿官吏问题，同时对民生问题也十分关注，尤其是粮食的储备。经过数番考察，他下令让士绅们都来出钱，然后用这笔钱采购了十万石粮食，分别储存在永济仓和义仓。

永济仓和义仓都是旧仓库，储量有限，装不下这么多粮食，谭钟麟又下令扩建永济仓。但永济仓周边土地有限，能够扩大的规模也十分有限，仍无法满足储粮需求，谭钟麟出面购买了霞湾巷一带的十亩民地另建仓廩。这个新建成的仓库，就是现在的富义仓。富义仓的建造于光绪六年十二月动工，落成于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耗时近44个月，共花费白银一万一千两。

根据《新建富义仓记》所载，富义仓十亩地，“为仓四、为廩八十，容谷可四五万石……其东筑楼三楹，属司事者居之。其西创屋一区，为茗场，驾乌榭以转环之。向南葺屋，为碓坊。”临河处还建了一个亭子，供往来运粮的工人们休息。富义仓建成后，谭钟麟向朝廷报告，使在他后面莅杭的官员要关注仓储，“散而积之，无方其数，为民忧”。富义仓落成没多久，谭钟麟调到陕甘地区去当总督了。临走之际，他把这个在他手上建造起来的仓库命名为“富义仓”，并请应宝时撰写《新建富义仓记》。

谭钟麟在浙江巡抚任上，不仅建造粮仓，还做了清查土地，核实漕平，更定厘税，治浚河道，鼓励商运，修筑炮台，重建文澜阁等一系列深得民心之事。他对富义仓的命名及对其所倾注的愿望，是美好的，然而故事的发展，一个建筑的命运，并不会全然按照个人的意愿而发生。1905年，谭钟麟病逝于湖南长沙。

1884年

1884年，清光绪十年12月的三更天，霞湾巷富义仓码头的河面上夜色蒙蒙，河面上却密密地停泊了二十艘黑色大船。

只见那大船扁浅宽大，方头、方梢，船面自头至梢，八尺八丈，头阔一丈二尺



五寸，深五尺，中阔一丈二尺六寸，深五尺二寸。稍阔一丈一尺七寸，深六尺三寸。每船需用“新杉篙木六十二根，松、樟、榆、槐二十余段，油、麻、铁、炭等料三千余斤”（《漕船志·料额》），板缝较大处皆是用麻丝、桐油、石灰调制填塞，铁钉则用桐油和石灰调制后封堵以防锈，船体细细地刷了几层桐油，吃水多年，“持沙行以寄泊，因底平稍搁无碍”。

浙江粮道廖寿丰站在码头上，眉头紧锁，入冬的杭城夜晚霜寒露重，外罩一件厚重的貂子毛大衣也抵不住寒意。他直隶于漕运总督，掌浙江粮储。朝廷历年漕运定限十月开仓，十二月兑毕，德宗十年的漕粮今日必须发运。

只是法军突袭马尾港，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海运瘫痪。朝廷复又将漕运重头移于运河水路。他在岸边独自踟躇，竟想到了前人的一句话——“漕为国家命脉攸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年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明史》）”。廖寿丰心中一凛，觉得怎能在此时想到灭亡者的哀叹，暗中懊恼万分。

夜色中，几十个松油火把照得河面亮堂无比。富义仓的储粮房内，十多个壮汉

在忙个不停，稻谷一入麻袋，立即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层层从里间递到外间，再递到挑夫肩上，一众挑夫肩扛手提，腊月里穿着麻布单衣都热得汗流浹背，只是腰不松手不晃，脚下的步子稳稳当当。从仓廩至码头到船上，无一不有条不紊。

监兑此刻最为紧张，每袋米需得在记录下登船，每船载米五百石。监兑一职是由同知、通判担任。把知府比作市长，同知就是副市长，通判就是副市级，杭州局粮通判正是此次监兑，他需得将漕粮逐船兑足，验明米色纯洁，面交押运官。然后亲督到淮安，在那里接受漕运总漕盘验。“粮数不足、米色不纯者，罪之”。过了监兑的环节，即是押运官的责任。他专门负责督押，约束运军，每条漕船皆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水手九至十名。

想到此去还有两个月水路，廖寿丰越发面色凝重。此时，富义仓的账房小步挪了过来，见他面有不快，不敢多言，只双手递过一本厚厚的账本。廖寿丰默默接过，逐一翻阅，今年的六十万石漕粮都堆放在江涨桥东北的仁和仓、广安新桥旁的广积仓、宝善桥西的永济仓、城内义仓和这富义仓内，另几个粮仓的漕粮和船只也都准备就绪。

半个月前，浙江巡抚谭钟麟受命调任陕甘总督。临行之际，他把在自己任上建造起来的仓库命名为“富义仓”，又再三嘱托廖寿丰万万要关注仓储，“散而积之，无方其数，为民忧”。

谭钟麟寄望富义仓成为百年基业，保得杭城百姓一碗白饭无忧。只是运河河道淤堵，加上漕帮势力日益壮大，定下“积歇、摊派、投文过堂”等运费陋规，与清廷叫板，漕运成本不断上涨。

廖寿丰于1893年上任浙江巡抚，不再操持漕粮事宜。不过七年后，1901年，光绪帝颁令宣布漕运完全停止，富义仓的命运完全改变。■



参考文献：

- 周笑纹. 富义仓城之命脉 [N]. 杭州日报, 2011年8月1日。
任轩. 富义仓 [N]. 杭州日报, 2012年11月8日。
许明. 运河南端说码头 [M]. 北京市: 新星出版社, 2013年6月版。



张闻涛 / 摄

大运河开拓者

撰文 | 周游

究竟是谁开挖了大运河第一锹？谁也无从坐实。不过，下令开挖大运河的第一人吴王夫差至今还“坐”在邗沟大王庙里。而我的思绪却被邗沟回溯到了春秋晚期——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也最为热闹的时代。王纲解纽，诸侯并起。你代天征讨，我吊民伐罪，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处刀光剑影，到处人喊马嘶。无数的国家就像流云飞鸟一般，此起彼伏。检阅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即使是最为详细的描述也

似电影的快镜头。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喧哗与骚动的时代，吴王夫差带着家仇国恨登上了历史舞台。即位之初，夫差未忘越国杀父之仇，日夜加紧练兵，时刻准备报仇。

越王勾践却因槁李之战侥幸射杀了吴王阖闾而沾沾自喜：阖闾已经死了，吴国还有什么可怕的！那就歌舞升平吧！在凯歌中，勾践潇洒地拭去“天下第一剑”上的血迹。



张闻涛 / 摄

那剑的寒光入鞘了！那就刀枪入库吧！
那就马放南山吧！将士何乐而不为？
槁李之战的血河很快就干涸了。两国捐躯的将士已是一堆堆骷髅和白骨。

公元前四九四年，勾践闻知夫差勤于练兵，贸然决定“先吴未发往伐之”（《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进攻了吴国夫椒。夫差亲率精兵还击。夫椒不是槁李的拷贝。越军很快就溃败了。吴军乘胜追击，直捣越都会稽。勾践成了瓮中之鳖，坐以待毙。越国谋臣范蠡建议勾践卑辞厚礼侍奉夫差。勾践无可奈何，命令大夫文种前去贿赂贪财好色的吴国太宰伯嚭。伯嚭欣然笑纳，立即带领文种拜见夫差。文种顿首膝行，代表勾践臣服。夫差欣然颌首。唐胡曾《会稽山》认为：

越王兵败已山栖，岂望全身出会稽。
何事夫差无远虑，更开罗网放鲸鲵。

公元前四九二年，勾践带着夫人入吴为奴。夫差命令他们夫妇：一个驾车养马，一个打扫宫廷。他们夫妇低三下四，百依百顺。听说夫

差患病，勾践竟然“问疾尝粪”（《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大王粪便又苦又酸，可谓顺应时气，贵恙不久便会痊愈。”在这世上还找得到第二个能够像勾践这样干的人吗？这个马屁拍得非常悲壮，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了！但是，这招十分灵验！不久，夫差果然康复，于是把手一挥：勾践，你可以走了！

伍员（即子胥）极力阻拦：“大王不可放虎归山。”夫差非常仁慈而且自信：“越国偏小，经过重创，必然一蹶不振，不足为患。”伍员仰天长叹：“这是养痍遗患啊！二十年后，吴宫就会成为越池了！”夫差拂袖而去：“危言耸听！寡人要省点精力争霸中原了！”就这样，勾践回国了。

勾践回国不久，貌令鱼沉的西施很快就率领越国“红粉兵团”“占得姑苏台上春”（崔道融《西施》）。

坐拥来自越国的美女，夫差又想到了勾践，于是遥望南方：一个能给寡人尝粪的走狗还会再成对手吗？既然越国已经宾服，那么就明目



张闻涛 / 摄

光转向北方吧！寡人应当逐鹿中原了！

夫差为什么要争霸中原呢？一是要实现先王称霸的遗志；二是当时中原诸国内乱不止，是北上称霸的大好时机；三是有些小国遇到大国侵略，也要吴国援兵。“是时越既败，楚亦未能遽振，吴之兵锋，遂转向北矣。”（吕思勉《先秦史》）

中原在哪？江北的邗国挡住了夫差的视线。当时的邗国都城就在今天扬州蜀岗之上。邗国太小了，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据说，周武王灭了商朝之后分封天下，把小儿子分封到邗，是为邗国。

吴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吞并了邗国，几乎不动声色。

邗国易得，中原难征。要想北伐，必须解决行军路线和后勤保障两大难题。就在筹划开挖运河之时，夫差得知齐国因为景公驾崩而乱的谍报。天助我也！该出手时就出手！寡人不能坐失良机！吴国要想称霸必须先打齐国这只拦路虎。伍员认为，勾践不死，就是吴国的祸患。夫差不听伍员的规劝，坚持挥师北伐。这次吴国舟师是由南黄海北上的，一路势如破竹，陷陈国、退楚兵、败齐师。中原诸国闻风丧胆，尤其小国，莫不献媚于吴。譬如，路过宋国，夫差居然享受了“百牢”的待遇。何为“百牢”？一百份牢。牢，古代祭祀或宴享时用的牲畜。牛羊豕各一为太牢，羊豕各一为少牢。按照当时规矩，诸侯只配享用十二牢。由此可见，夫

差待遇之高。再说，路过鲁国，鲁哀公赶到鄆城，也以“百牢”招待夫差，并把附庸之国划入吴国版图。

夫差终于耀武扬威了！

不过，夫差回国之后并没得意忘形，念念不忘航海的风险。那就沟通江淮吧！什么一江春水向东流！人定胜天！寡人偏偏要让江水北上！

公元前四八六年秋，夫差先在不久前被灭的邗国筑城屯兵积粮，并挖通了从长江到淮河的运河。

检阅《左传·哀公九年》，我们不能不抱怨左丘明“瞎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这八个字浓缩了多少军民的血汗！这就是

中国京杭大运河最早开挖的一段，邗沟。邗沟，又名邗江，经过扬州城北，然后向东，继而向北，然后串连了邵伯湖、高邮湖、宝应湖，一直挖到淮河，总长大约三百八十里。夫差开挖邗沟，除了便于交通，又是水利建设。它具有灌排的功能，使得江淮地区逐渐成了从低洼沼泽地变成了米粮田。因而，原来相差很大的长江南北两岸的文化，逐渐趋于一致。

沟通江淮之后，夫差又沟通了泗水、沂水和济水。这样，夫差就完成了北伐的通道。

得知夫差又要北上攻打齐国，勾践采用了孔子门生端木赐（即子贡）的计谋，派遣人马帮助吴国作战，并且贿赂伯嚭。伍员极力反对，指出越国才是心腹大患。夫差不听，继续伐齐，

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之战中大败齐军，获胜而归，夫差十分得意，不久又听信了伯嚭的谗言，赐剑令伍子胥自尽，伍子胥死前说：“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

伍子胥死后，吴王将政事交给伯嚭管理。勾践得知伍子胥已死，拟起兵伐吴，范蠡认为时机未到，还需等待。

公元前四八二年夏，夫差带领大军北上，赶到黄池（今河南封丘），去和晋国争夺诸侯盟主，几乎忘却了背后的勾践。就在夫差的霸业一步步走上顶峰的时候，一直“卧薪尝胆”的勾践乘虚而入。由于过度的扩张，夫差虽然做出了惊天动地的霸业，但是也把民力财力消耗殆尽，这时的吴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抵挡不住越国军队，屡战屡败。夫差后悔当初未听伍员的劝告，饮恨自杀，死前只求不要伤害吴国百姓。吴国就这样灭亡了！勾践又利用邗城和邗沟北上称霸了。

唐代诗人于濬有《经馆娃宫》诗评论了吴越混战的历史：

馆娃宫畔顾，国变生娇妒。
勾践胆未尝，夫差心已误。
吴亡昔谁在，越胜今何处？
当时二国君，一种江边墓。

尽管作者流露出一些虚无主义的情调，但是这段历史发人深思。恃强凌弱之人，定有不测之祸；争霸逞强之国，终有难逃之灾。

话说回来，世人往往推崇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但是忽略了他那“问疾尝粪”无耻嘴脸。扬州人之所以敬重夫差，是因为他舍身救民。固然，“夫差耗竭民力，经营霸业，因而亡国，

但南北水上交通却从此创出新局面。”（范文澜《中国通史》）窃以为，夫差开凿邗沟绝非信口开河，更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而有他全盘的战略考虑，是为了实现他的称霸的雄心。从长远来看，他的这些措施，把吴文化引入了长江以北，加快了这一块区的开发；同时，也促使吴文化和中原文化进一步结合。对中华文化的融合，夫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诚如徐谦芳所言：“吾邦自吴王城邗而后，交通便而文化兴。”（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

毋庸讳言，夫差在政治和军事上是一个失败者，但他却是扬州文明的奠基人，也是江淮文明的奠基人。“开拓东吴财赋地，君王终究是雄才。”（詹肇堂《邗沟庙》）所以，清代学者汪中写下《邗沟夫差庙》诗：

吴山旧庙蜀山陂，沟水东流绕殿基。
春社神巫时击鼓，好风贾舶互扬旗。
侈心齐晋终亡国，遗利江淮合荐祠。
可忆姑苏台上乐，青山歌舞对西施。■



凤山烟雨

口述—高建和
执笔—金为民



凤山水城门（晚清）

凤山烟雨是运河十景之一，“凤山”应为凤凰山，是凤山门和凤山水城门（古时此两门并列，与古城墙相接）的总称，“烟雨”是形容南宋之后频繁的政坛变迁，翻滚的历史风云。

我舅舅是打年糕的，家住水城门近旁的六部桥畔。水城门下流淌的是中河，它自白塔岭引钱江水后，一路向北，穿水城门过六部桥，再流至梅登高桥，最后出水到运河。孩提时舅舅管我叫“外甥皇帝”，可看出舅舅对我是何等宠爱，他常用年糕团捏成一对龙和凤，给我先玩赏，后品尝。龙凤的眼珠用的是黑色的中药丸，身上描红涂绿，造型优美，煞是可爱。饭后茶余舅舅常带我去水城门及凤凰山上转悠，边走边给我讲了“西湖明珠从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的神话

故事。经舅舅的调教，我能背诵经典的古城门名谣：

武林门外鱼担儿，
艮山门外丝篮儿，
凤山门外跑马儿，
清泰门外盐担儿，
望江门外菜担儿，
候潮门外酒坛儿，
清波门外柴担儿，
涌金门外划船儿，
钱塘门外香篮儿，
庆春门外粪担儿。

现在想来，这武林门、艮山门、凤山门也都与运河有关。神话故事的有趣和新鲜使孩提时的我充满了对世事的好奇和憧憬。

成年后得知，绍兴十八年南宋在凤凰山一带筑皇宫。那时三省六部的官员就住在六部桥畔，且每天上朝来回都得走六部桥，下跨中河水，直至皇城的南门丽正门。

今天的我等自然上不了朝，但我时常会到那里闲坐遐想，自有一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境。特别是水城门，运河与它隔河相望，运河能时刻知晓来自中河的水质、水情，乃至知晓城门上变幻的大黄旗。

元末，农民军领袖张士诚修城墙，在原和宁门位置偏南处重修城门，改名凤山门，又称正阳门。除了皇室正史外，此地还趣闻多多。一是当年陆游在上早朝前爱买糖炒栗子解馋，晚年还写了《夜食炒栗有感》；二是杨万里写了《经和宁门外卖花市见菊》，最后两句是“君



不见内前四时有花卖，和宁门外花如海。”看来南宋最大的花市应该就在凤山门脚下。

凤山门外跑马儿又何故？因现利群烟厂地块内，是原清军骑兵的营房，民国时期这里也养马（供骑游）。而门外万松岭一带地居枢要，风景优美，自然成骑马踏青的好去处。

1913年后古城墙因筑路而陆续拆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叹当年巍峨的十个城门被历史冲刷，摧枯拉朽后唯留座座石碑。水城门处也仅存十余米的城墙。舅舅的家今也荡然无存。

然念旧的我还是常去那里，不是站在水城门上，就是漫步在六部桥一带的中河畔。只见水城门修旧如旧，其遗址上新辟了美丽的水城门公园，这一带绿化成荫，真可谓“红杏枝头春意闹，翠枝轻摇绿添凉。舒心养眼人欣欣，绿不言语最可人。”

更可喜的是，凤山水城门也为运河申遗立了大功。■



张闻涛 / 摄

大运河放筏

撰文 | 高同先



张闻涛 / 摄

早有所闻大运河放筏惊心动魄，是一大景观。当我亲临放筏现场时，才知道名不虚传，也知道了大运河放筏是一种古老纯朴的民俗风情，每年都要举行一次。

过去，水上运输很繁忙，因为走旱路靠小毛驴、小推车，运不了多少东西。所以，大部分的商业往来和交通运输还要靠水运来承担。航道上或沿岸生活的人总会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故，为了祭奠那些在大运河中遇难的人们，便有了大运河上放筏的风俗。

放筏之日，大运河沿岸便一下子沸腾起来

了，平时不出门的，十里八乡的，甚至一些外地人，都要三五成群、几十结队地朝着运河涌去。据说，放筏的地方曾是当年穷苦百姓逃荒必走之地。

老远就看见河岸上早已挤满了前来观看放筏的人，他们在等待着，等待着那一壮观的场面。此刻，正有一队队放筏的人抬着五颜六色的木筏、皮筏、竹筏向渡口走去。

中午十二时整，只见一位老船工燃起火把，站在中间的一个筏子上庄严地做了一个手势。顿时，数百条筏子一齐出发，唢呐锣鼓声乍起，水声呐喊声震天。微风中，筏子上各种颜色的



张闻涛 / 摄

彩旗迎风招展。按风俗，每只筏子上必须悬挂三百六十五条彩旗，表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平安，一帆风顺。但眼前这大河水告诉我们，大河水虽平缓流动的居多，但在上游地段却是桀骜不驯的，它的汹涌险恶让我相信，船上的人掉进水里非死即伤。再看看那位饱经沧桑的老船工，他不正是千千万万个大运河船工的缩影吗？祖祖辈辈的大运河人，不正是这样日日夜夜与大运河朝夕相处，才得以生存下来的吗？

再看河面上，似千树繁花，竞相开放，如万点星光，吹落人间。大运河变成了一条彩色的河流，形成了百舸争流的场面。抬头仰望天空，腾空而起的烟花在大运河上空呈现出斑斓的色彩，它与漂动的筏子交相辉映，构成了大运河上最为壮观的风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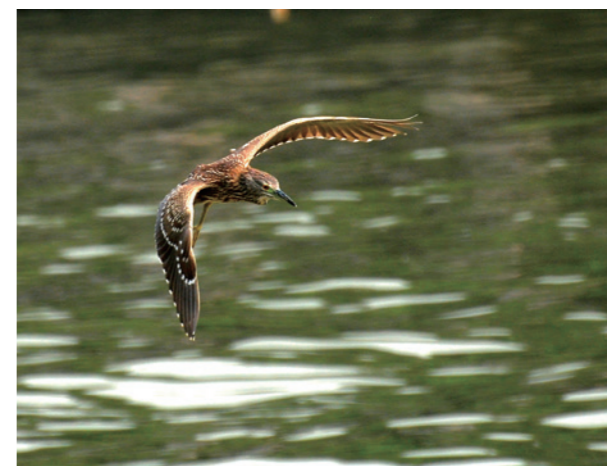
据说，在大运河上白天放烟花，绝无仅有。这是我从来没有领略过的一种壮举，也是从没有经历过的一种生命的体验。可以想象，在那河岸上密密匝匝的人群中，也许会有当年渡大运河逃荒求生的汉子们；有怀着依恋心情送别亲人的妻儿老小；有靠大运河生存的水上船工……

目睹大运河上的种种变迁，很容易就让人想到流走的是岁月和历史，带来的是希望和未来。比如大运河放筏，过去是一种祭祀活动，记载了大运河两岸人民苦难辛酸的历史和辛勤的劳作。如今的大运河放筏，已成为一项群众文化活动，象征着大运河两岸人民光明幸福的生活和文明与进步。

大运河放筏，是一幅跨越历史的画卷，也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

运河风情

CANAL STYLE



扬州行
遗韵悠悠在木渎



扬州行——看琼花

撰文 | 刘黎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可见扬州之美足能成为孟浩然西辞的主要原因。据说，隋炀帝杨广开凿运河并非是传说去看江南美女，而是去看“烟花”——扬州市花琼花。

琼花是何物，能入帝王的眼睛，诗人的青睐？北上看扬州琼花就成了我自驾游扬州的初衷。为了这期待，那年春假的第一天早上，一路飞驰，脑海里尽情遐想这帝王之花是怎样的？四个小时的车程，下榻扬州宾馆不久，便直奔赏花处——瘦西湖。

第一次见到琼花，我便肯定刘敞所云：“天下无双独此花”绝非虚言。琼花不同于其它花卉，它不能用“朵”来衡量。一簇琼花，由八朵五瓣大花围成一圈，簇拥着中间一团珍珠似的白色小花。花大如盘，洁白如玉，不由让人叹其奇特与瑰丽。星星点点的，小珍珠似的小花簇拥在中心处，挨挨挤挤，泛着淡淡黄色，柔嫩可爱。素白色的大花，重叠娇美的花型，淡雅的颜色，寥寥五瓣，显得清秀脱俗，风姿绰约。大花瓣迎风而立，玉琢冰雕；嫩黄色的小花



苞绽放于风中，花苞“化茧成蝶”，变成不及小拇指大小的小白花，黄绿色的花蕊在一片白色间隔处格外显眼，衬着满树的绿叶。淡淡的香气，不及茉莉花馥郁芬芳，却有那淡然超世的沁人心脾。

我以为，琼花之神韵，全是因八朵小花相聚之缘故。北宋词人韩琦有诗曰“维扬一株花，四海无同类”。此诗句恰如其分写出了琼花奇特。洁白的小花，不求各自娇媚，弄舞也携手，宛如八个仙女相聚起舞，仿佛为相聚而来。琼花古称“聚八仙”的别名自然在情理之中了。在琼花前站久了，自有一种香气悄然而至，丝丝缕缕，若有若无，挥之不去，难以忘怀。

“千古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为了看琼花，当年长河已飞架成高铁，锦帆也变为汽车，昔日的帝王也成为一睹琼花的寻常客。为了看琼花，在登帝前任扬州九年总管的隋炀帝硬生生地开了一条运河。在位14年，先后三下扬州巡游看花，一直被后人诟病的“倒霉皇帝”，死后其陵园一直门前冷落车马稀。其实，隋炀帝下扬州看琼花是明清以后小说虚构的故事，他死在扬州之前，琼花还没有出现。一直过后350年左右的宋代，琼花粉墨登场。所以说，像关公不可能战胜秦琼一样，隋炀帝来扬州是不可能看到更不是为看琼花而来的。说他去扬州看琼花，着实往他头上扣了一坨屎。那些虚构的故事，就是在正史不详不实的前提下，致使野史盛行，传说鼎沸，诗文夸张，将主人公弄得比粪坑还臭。隋炀帝就是这样的一个倒霉鬼。

稔知正史的都知道，隋炀帝曾任扬州九年总管，日久生情，有浓烈的“扬州情结”，他开了运河，筑了长城，下江南铺张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更重大的政治背景和深刻的文化使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明清小说的无聊杜撰只是迎合庸俗小市民的口味，把隋炀帝南巡丑化得无以复加，副作用代代相传。

这样想来，隋炀帝与琼花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但扬州关于隋炀帝的各种故事更激起了我的好奇。而琼花，其美艳不管是否和历史有关都一样楚楚动人，值得前往观赏留恋的。

这次扬州看琼花，不单是赏花，也钩沉了一段历史。■



遗韵悠悠在木渎

撰文 | 葛冬梅

白墙灰瓦红灯笼，小桥流水乌篷船，
构成一幅悠然、浪漫而沧桑的画卷，
无尽地延伸，伸进千年柔弱、诗意与才气交错的历史



木渎古镇，身在苏州，也便与苏州一般，文质彬彬，一派大家闺秀的气象。小桥，流水，石板路，我在古镇里悠悠荡荡。江南的神韵，在于它保存完好的古镇。白墙灰瓦红灯笼，小桥流水乌篷船，构成一幅悠然、浪漫而沧桑的画卷，无尽地延伸，伸进千年柔弱、诗意与才气交错的历史。

木渎四周群山拱峙，又毗邻太湖，既得真山真水之趣，又具小桥流水之幽，更有私家园林、名人故居等众多的人文古迹。景色与哲学的和谐融通，生活和精神的完美统一，过去与现在的遥相呼应，只有江南，才足够生动。

一样有其他江南水乡的温柔秀美，但木渎更有苏州园林的典雅脱俗，这就是木渎独有的气质。这里是苏州评弹的“圣地”，也是吴侬软语最地道的出处，还是苏绣的发源地，据说古时木渎“户户有绷架，家家会刺绣”。木渎面积不大，但也有“十景”，可见其景色之精致。

木渎太有江南文化的精髓了，因此迷恋江南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六次都在这里舍舟登岸。大处壮美、小处秀气的虹饮山房，是乾隆每次登岸必然游览和居住的地方，因此被称为“民间行宫”；而乾隆一朝的著名大臣纪晓岚、刘墉、和珅都曾多次下榻于此。木渎历史可上溯吴越春秋，文化蕴积深厚，名胜古迹遍布。境内除了山川林石之美，更有小桥流水之秀，古宅深巷之幽。镇上河道纵横，桥街相连，其中胥江、香溪均为吴越遗迹，山塘老街则为乾隆御道，小镇人家或临街或枕河，粉墙黛瓦，重脊高檐，一派典型的水乡古镇风貌。古镇深宅大院毗连，



尤以严家花园、榜眼府第和古松园等私家花园为最，其中严家花园集苏州园林之大成，为江南名园。木渎古镇依山而筑，傍水而居，其独特格局为江南诸多古镇中少有。清人王汝玉的诗句道出了木渎古镇之魅：山近灵岩地最幽，香溪名胜足千秋。

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街道，两排挤挤挨挨的瓦屋把蔚蓝的天空夹出细长的一条，屋顶叠着的那些片片青瓦，在阳光下如飞动的鱼鳞。清亮的水巷上，横跨着一座座小巧玲珑的石桥，百步三桥，错落有致，巧连妙勾，与对面傍溪而筑连绵不断的屋宇檐廊衔接，任意通达每一个门户，每一个巷口。

漫步镇中，仿佛进入了迷宫似的殿堂，幽深迂回的巷道如秋波流转四通八达，“行至幽厢疑抵壁，推门又见一重庭”，多进宽敞的厅堂，与岩石青砖砌成的天井环环相扣，互为比照、映衬，木椽石柱不翘不裂，浮雕凸现，门庭窗棂花纹雕饰精致典雅，栩栩如生。镇子最奇妙的景观，曲径通幽的巷道，是独具特色的建

筑艺术结构。独特的建筑艺术遗韵和邈远的地方风貌折射出民族的智慧、文化的积淀，中外学者游客纷纷前往，访古探幽。

小镇很古老也很简朴。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街面，被千万双脚打磨得幽幽发亮，把一段悠远的历史融凝进去，不留一丝痕迹。木渎是一座因园林而生辉的古镇，2500 年的历史积淀中先辈们留下了一座又一座精美的古典园林，在这个清丽的季节，走进那些小桥流水围绕的庭园，一起去探寻萌生在古桥、长廊、水榭、池沼、春花……中的优雅诗意。

古镇最精美的园林都位于山塘街上，这是一条很清、也很静的石板路，路的一侧是流淌了千年的香溪河。这条河曾因浸润过西施的胭脂水而满河生香，春光中河岸烟柳盛情地绿着，一直绿到了涟漪荡漾的河心，绿意阑珊中晕开着丛丛粉桃，似那美人脸上动人的胭脂。坐着摇橹船的过客，在船娘软糯的吴歌里，游走过一座又一座苍老的石桥，任凭手中的镜头自如地选择。这一刻，盛世的春光在湖面乍泄，红粉的江南在心间驻守，一颗归来的心在等待缓缓靠岸。

靠岸，是当年乾隆登过的御码头，踏上古拙的石阶，巧遇“乾隆巡游”的盛况，想必这“吹吹打打”的热闹也只能追逐到百年前繁华木渎的一点影子吧。那时候的乾隆英姿勃发，流连于迷人的江南，而每次必来的木渎这样姹紫嫣红，让他一醉再醉……

走上绵延的山塘街，很容易走进恍惚的思绪里，而一丛深宅里探出的花却瞬间把人拉进园林的深处……

严家花园的古广玉兰苍盛地开了，积蓄着几百年的皇气，每一朵都极为富贵；池沼旁，迎春初绽、锦鲤鲜活；长廊深处，山茶艳丽，零落的花瓣点染了初醒的花园。后院中，烟柳飘摇、粉桃娇嫩，垂落于拱桥畔的一枝枝海棠花将诗意的春情满满盛开。虹饮山房的御戏台上昆曲正酣，婀娜的水袖婉转，一颦一笑里流盼出前世的回忆，只听得那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竟让人失了神，不知当年的乾隆爷是否也曾在此刻失神过？碎步走进古松园，那棵 500 年的罗汉松依旧挺拔矍铄，针叶上饱含新绿，在新一轮的季节里扩张着古老的生命力，让人在俏媚



的春色中萌生出几许淡淡感动。

要阅尽木渎的春色，园林只是一部分，看那灵岩山下的雍容牡丹，才知春色的华贵。满山遍野的花色铺开，秀雅高洁的白牡丹、端庄瑰丽的红牡丹、清新脱俗的绿牡丹……在山水之间轰轰烈烈地怒放着，将木渎的春渲染得极为明艳！

如此气势恢宏又不失江南韵味的园林，在古镇中只有木渎才有。虹饮山房还收藏着二十道清代圣旨真品，可以让参观者一饱眼福。

看了虹饮山房，还必须再看看严家花园。龚自珍称赞它“妙构极自然，意非人意造”，而现代建筑学家刘敦桢教授则认为，严家花园是苏州园林中翘楚。

既然是江南，游览木渎，最好的方式依然是乘坐乌篷船，把自己一桨一桨地送进木渎的写意画卷之中。

天街的小雨润湿了古镇的石板路，香溪河畔的草色开始生动地绿起来，温润的风拂过，催开了桃花的笑靥，吹动了初醒的河面……邂逅春天的木渎，如同邂逅一个温婉的女子，在眼波流转中，凝望着彼此蔓延的微笑，盎然你一生的心动。双桥其实是一座桥。因为河水清澈而安静，这座古老的石拱桥像照镜子一样清楚地投下倒影，因此被取名为双桥。名字本身就是江南的味道。这座桥就是周庄的代表性景观。游人们到此都要寻它千百度，或驻足桥上，游目四顾，或坐船穿过桥洞，荡碎桥的倒影。

沿河都是店铺，主人们都在店门口摆着竹椅，可以任意地闲坐，端着一杯清茶，看着夕阳洒在柳枝上，胡思乱想。不时地有船从身边经过，船夫哼着听不懂的小调，也不知是不是信口胡诌，总之还算入耳。歌声阵阵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让人想象着水波的兴与灭。

如今，木渎古镇的格局和风貌未变，依然是吴西最大的商埠、姑苏第一水镇，镇上古宅庭院深深，小桥流水悠悠，其中胥江为伍子胥所建，乃我国第一条人工运河，香溪因西施在此梳妆满河生香而名，木渎的每一条河，每一座桥都有一个古老美丽的传说，具有极高的观赏和休憩价值。

木廊桥是木渎最富特色的建筑之一，江南一带多雨，故在城郊野外旅人必经之途，设廊桥以避风雨，而在集镇中设廊桥的还是不多。每当月夜，栖鸟缄默，微风敛迹，月落水底，浑似一幅精湛的国画，清新而淡雅，令人遐思不已。

玩木渎还不要忘了去山塘街品尝老字号“乾生元”的枣泥饼，这也是木渎一绝。枣香浓郁，松软酥脆，食后留香回味，若能在镇上书场泡上一壶香片，吃上一块枣泥饼，听上一段评弹，这古镇的韵味，便会如同这枣泥饼一样齿颊留香，流连忘返了！■

运河史话

CANAL LEGEND



运河功臣郭守敬
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水神」
千年浮沉大运河



运河功臣郭守敬

撰文 | 崔建利 王欣妮



一、开物成物，功施千载的水利专家

郭守敬(1231-1316年)，字若思，河北邢台人，元代著名科学家，在天文、水利、数学等方面都有杰出成就，明史称其“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1](卷一六四，列传第五一，第2435页)。郭守敬的祖父郭荣学识渊博，不但通晓经书，对数学、天文、水利等都有研究。童年时代的郭守敬在祖父的教育和熏陶下，对自然科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又跟从刘秉忠学天文、地理等知识，中统三年(1262)，由于他在科学及水利方面的不俗表现，被推荐给忽必烈，当时便向忽必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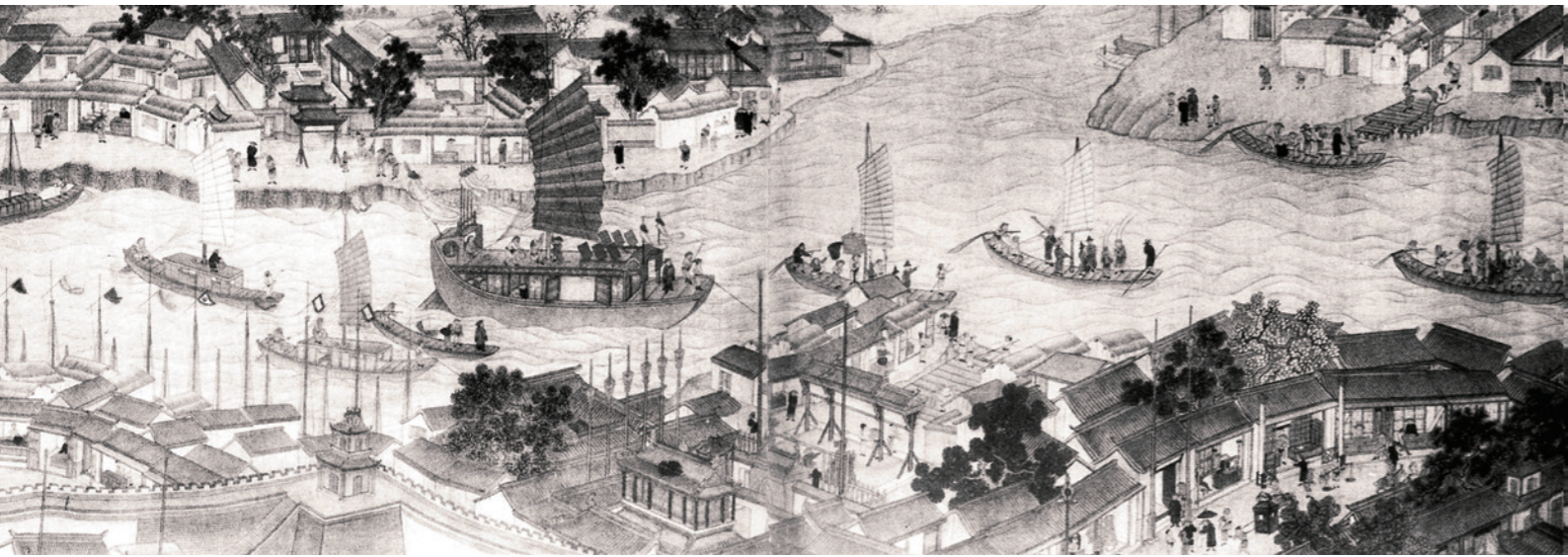
陈述水利六事，世祖叹曰：“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2](卷一七一，列传第六八，第2763页)至元二年(1265)郭守敬即被任命为都水少监，协助都水监管理河渠、堤防、桥梁、闸坝等修治工程。1271年升任都水监，主管全国的水利事务，而对京杭运河的重新规划与设计，便成为郭守敬水利成就的亮点之一。

历史上的中国大运河虽然都以京、杭为端点，但大体经历过两种规制或走向。一种是元代以前的大运河，主要是隋唐时期形成的，以中原腹地洛阳、开封等为中心向北京、杭州两个方向展开，略呈扇形或弓形分布，学界一般称之为隋唐大运河或大运河；另一种是元代以后的大运河，通过山东段运河的开凿，京杭之间不再绕道洛阳一带，航道被大大拉直和缩短，这就是学界乃至民间沿称至今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的真正设计或规划者便是郭守敬。通过对隋唐大运河的截弯取直，京杭之间缩短行程近800公里，初步奠定了元代迄今京杭大运河的走向和格局。这是郭守敬对京杭大运河的最大贡献。此外，郭守敬还设计并亲自主持了通惠河的修建，使漕粮可以直运京城。由于郭氏对京杭大运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贡献，故被尊称为京杭大运河之父。

二、元朝定都北京，大运河重心北移

元代以前的大运河主要是隋唐时期开凿或形成的，虽然这时的大运河也是北起北京，南至杭州，但运河的中心或重心在洛阳一带。1271年，忽必烈废弃“蒙古”国号，定国号为“大元”，将国都定在燕京并改称大都，打破

了宋代以前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将国都定在中原腹地长安、洛阳或开封的局面，同样，以洛阳、开封等为中心呈扇形张开的大运河，也不得不将其重心移到了最北端——大都。公元1276年，元朝发兵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统一了中国全境。江南粮仓对于元政府的重要性更为显著。当时的南粮北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海运。粮船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锚，出长江口沿海岸北上，绕过山东半岛，驶入渤海湾，傍岸到直沽(今天津市)，然后再循白河(今北运河)达通州(今北京市通县)。海运有优点，如运量大，节省人力和费用，但海难较多，常有船舶漂失，不及河运安全。一是水陆转运。江南漕粮沿江南运河、淮扬运河、黄河、御河(卫河，相当于永济渠中段)、白河抵通州。这条运道问题较多。黄河为西东走向，北上漕船须向西绕道河南封丘，从封丘到御河，还有200多里，无水道可以利用，必须改成车运，道路泥泞，车行困难。而且，因为兵连祸结，战乱频仍，这条运路中的漕渠多受损毁。其实，自北宋徽、钦二宗起，运河已渐淤塞，靖康年间，金人南下，汴京被围，漕运几近中绝，汴水“堤岸失防，汴流久绝”^[3]。“靖康而后，汴河上流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4](卷九四，《河渠》四，第1490页)金与南宋中分南北达数十年，隋唐以来的大运河被拦腰切断。乾道年间的南宋使臣楼钥在北上途中见旧汴水“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在其中，亦有作屋其上”^[5]，可见，老汴河已是一副残败景象，水陆转运的困难可想而知。



因此，如何将大运河截弯取直，从淮北直接穿过山东进入华北以达大都，成了元政府的当务之急。

三、山东段运河的规划与修建，大运河截弯取直

1. 郭守敬奉命考察，初步绘出大运河截弯取直的线路图。面对多渠道运输均有不便的局面，元政府逐步于山东西部大力兴举了开挖新漕渠、划直南北大运河的工程。至元十二年（1275），元军大举进攻南宋。因军事转输问题，元廷“议立水站，命（郭）守敬行视河北、山东可通舟者”（卷一六四，列传第五一·第2436页）。“守敬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济州至沛县，又南至吕梁，又自东平至纲城，又自东平清河逾旧黄河至御河，自卫州御河至东平，自东平

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汶、泗与御河相通形势，为图奏之。”（卷一七一，列传第六八·第2763页）初步形成了大运河弃弓走弦的方案，即将隋朝完成、呈扇面展开的大运河截弯取直，北端自大都起至通州，保留永济渠河北段，后进入山东德州，再南下聊城、临清、济宁，进入永济渠、山阳渚，经扬州越过长江与江南运河连通，直达运河最南端的杭州。弃“弓”走“弦”后的这条南北大运河，比起扇面展开的隋唐运河航路大大缩短。

2. 济州河的开挖。郭守敬所规划的大运河截弯取直路线深得元世祖的首肯，朝廷本计划于至元十三年正月开始“穿济州漕渠”工程，但当时对宋战争正在进行之中，没有力量从事这项工作。再则，因制定新历法的需要，郭守敬被调去负责历法的制定，郭守敬主政的“都

水监”也合并到了工部。直到至元十八年（1281）十二月，元政府才按郭守敬的规划方案，派兵部尚书奥鲁赤负责修建自济州（今济宁市）至须城（今东平）安山镇的济州河，翌年十二月完成，全长75公里左右。济州河引汶水、泗水为源，当时亦称“东平府南奥鲁赤新修河道”。济州河挖成后，便开始了引水工程建设，主要是开挖引水河道和对相关河流上原有的闸堰进行改建，原计划修建十四座石闸。至元二十一年（1284），朝廷另责成漕运官员马之贞和监察等到实地巡视并负责修改闸坝计划，最后确定建造八座石闸和两座石堰。这样，漕路由淮河入泗水（今中运河），经济州河北达安山，出大清河（今黄河下游）经东阿（在今山东东阿南）、利津入海，漕船再循海岸北上入直沽（今天津市大沽口）转赴大都。即南来漕船可直入大清河至利津县出海，海运至大沽以达通州。后来改由安山以北陆运至临清转入御河抵通州。这两条运输线路或风险太大或耗费人力，于是，开凿一条将济州河与御河连接起来的新河道的呼声日高。

3. 会通河的开凿。至元二十四年（1287），太史院令史边源、寿张县尹韩仲晖向朝廷建议：自安山穿渠至临清通御河。这正是郭守敬早已规划好的通漕线路。于是中书省派漕运副使马之贞与太史院令史边源等人再去勘察地形，并且估算工程费用和所需要的材料，绘图上报。前期工作准备妥当之后，元廷下令开凿会通河，具体施工由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和马之贞主持。工程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开始，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

全长一百二十五公里，当年六月十八日竣工。初名安山渠，因为它是通江淮之运的黄金水道，忽必烈命名为“会通河”。

郭守敬在会通河的开凿中究竟起没起作用？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现存文献对此记载颇显混乱。有的将郭守敬视为会通河开凿工程的直接负责人，有的则认为会通河的开凿直接由礼部尚书张孔孙等负责，与郭守敬无关。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实际情况是，济州河、会通河的开凿线路是郭守敬受朝廷之命早就勘察规划好了的，就这点来说，郭氏应为会通河工程的规划和设计者。再则，会通河修凿过程中，郭守敬虽不直接负责工程，但作为当时的工部郎中并太史院负责人，郭守敬对此工程应该负有管理或指导责任。因为会通河开工前后，都水监已经并入工部，太史院主管正是当时的工部郎中郭守敬。至元二十三年（1286），郭守敬已经完成了《授时历》的相关研究与天文历法及测验图书的编写和整理工作。因此，会通河开工前后，郭守敬已经有时间参与这段工程的管理和指导工作。元代人王喜在《治河图略》中记曰：

“世祖皇帝尝设置分监，委任都水马和之、郭若思疏决新河之水，导黄流由安山抵临清接御河，相地形设开隄，通漕运，遂成千载之功”。^[6]（卷首“治河之图”，《丛书集成初编》第1486册第二0页）

马和之即马之贞，字和之，郭若思即郭守敬。“新河”即指当时新开凿的会通河。时人王喜的这段记载是可信的，说明会通河的开凿过程中，郭守敬作为部门负责人，亦应负有管理或指导之责。

济州河、会通河（明代重浚会通河后，这两河段通称会通河）的开通，使山东运河规模初备，尽管当时郭守敬没能选准南旺分水点的正确位置，从而使这段运河的通航能力大大受阻，以至从总体上影响了京杭大运河的运输能力，但通过大运河截弯取直、弃弓走弦，大大缩减了航程和运输成本，实现了江南物资由徐州北上直通京都的现实，从而真正奠定了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规制和基础。

四、开凿通惠河，漕船直抵京城

在郭守敬设计并负责督开通惠河之前，江南漕粮只能通过大运河运到通州。本来从通州有一条运粮河通往京城（大都），但因为水源不足，通航能力差，多半处于荒废状态，只好将漕粮从通州用牲口驮运到大都，不仅耗费人力，而且一到雨季，道路泥泞，畜病人疲，运输更显艰难。所以，让大运河直通大都，就成为元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任务自然又落到了水利专家郭守敬的头上。至元二十八年（1291），郭守敬经过仔细考察，决定在旧的京

通运粮河上重新开浚。提出了大规模跨流域调水，疏流通州至都城河，修建京通运河的规划：

“疏凿通州至大都河，改引浑水溉田，于旧插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自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卷五三，志第二〇，河渠二，第1353页）即引白浮泉水沿地形等高线西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的一亩泉、玉泉诸水入京城，这就成功地解决了老运粮河水源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旧的运粮河河床坡度大，不易存水的问题，郭守敬还对坝闸和斗门进行了改进，不但节约了水源，还使漕运更通畅。通惠河全长82公里，工程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春委开始动工，翌年秋全部完工。至此，从杭州至北京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江南漕船直接驶入大都城。元世祖忽必烈看到漕运通了，积水潭水面上来来往往的帆船，异常高兴，遂将京通运河赐名“通惠河”。■

参考文献：

- [1]（明）宋濂.元史[M].长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 [2]（清）柯劭忞.新元史[M].长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 [3]（宋）邓肃.辞免除左正言第十六札子[A].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83册）[M].卷四〇一五，《邓肃》二.上海市：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129页。
- [4]（元）脱脱等.宋史[M].长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 [5]（宋）楼钥.北行日记[M].卷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5册）[M].第78页。
- [6]（元）王喜.治河图略[M].卷首“治河之图”，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张闻涛 / 摄

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水神”

撰文 | 胡梦飞

201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大运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京杭大运河作为沟通我国南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在促进沿线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地域往来对沿线区域民间信仰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运河的流经，导致了水神信仰的盛行。水神信仰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分布地域广泛，祭祀各种水神的庙宇和祠堂遍布运河沿线的城镇和乡村。

佑国金龙四大王

在众多的水神信仰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的祭祀和崇拜。金龙四大王名谢绪，浙江钱塘县北孝女里（今杭州良渚镇安溪）人，隐居在安溪下溪湾。因其排行第四，读书于金龙山，故称金龙四大王。南宋亡于蒙元时，赴水死。朱元璋征战吕梁洪时，据说谢绪的英灵曾骑白马率潮水助阵，遂被封为水神。因其具有护漕、捍患的功能，多显灵于漕运和河工危难之时，故不



断得到明清官方的加封。景泰七年(1456),明朝政府采纳左都御史徐有贞的建议,建金龙四大王祠于沙湾。隆庆六年(1572)六月,派兵部侍郎万恭前往鱼台致祭,正式敕封河神谢绪为“金龙四大王”。清朝建立后,官方和民间对金龙四大王的崇祀推至顶峰。从顺治三年(1645)开始,清朝历代皇帝不断给金龙四大王敕加封号。至光绪五年(1879),金龙四大王最后的封号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翊宣诚灵感辅化襄猷溥靖德庇锡佑国济金龙四大王”,共49字之多。

明清国家和地方官员的倡导和推动,漕军、水手、船工、渔民、商人等社会群体祈祷和祭祀的需求,使得金龙四大王庙宇遍布京杭大运河沿线区域各州县的城镇和乡村。据统计,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线区域有金龙四大王庙宇150余处之多。淮安下属的清河县因地处黄淮运交汇处,水患极为严重,所以弹丸之地居然有17座金龙四大王庙。扬州府的江都、宝应、泰州、东台等地也都有金龙四大王庙的分布。江都金龙四大王庙“在西门外文峰塔湾”;甘泉县金龙四大王庙“在东门外黄金坝西岸”;泰州金龙四大王庙“在北门外西坝口”;东台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县治西门外海道口”。民

国《铜山县志建置考》记载徐州铜山县境内金龙四大王庙就有三处:“一在北门外堤上,一在河东岸,一在房村。”同治《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城西南,明知县宋伯华建。康熙二十四年,总河靳辅改建于城西南堤上,有敕祭文”。此外,德州、临清、东昌、兖州、嘉兴、杭州等运河沿岸地区都有金龙四大王庙宇的分布。

皂河龙王庙,原称敕建安澜龙王庙,位于宿迁皂河镇。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安澜龙王庙“在县西北皂河镇,康熙中建,雍正五年奉敕重修”。雍正五年(1727),因当年黄河河清,雍正皇帝敕令河道总督齐苏勒重修皂河龙王庙。皂河龙王庙虽名为龙王庙,但祭祀的主神为金龙四大王。河道总督齐苏勒修庙奏疏云:“臣酌估修建金龙四大王庙一事,臣谨查江南黄河一带所建龙王庙宇甚多,或地处沮洳,或庙貌狭小,均不足以壮观瞻,惟宿迁县西皂河之庙地势高阜,四面宽敞,庙貌轩昂,且介于黄、运两河之间,与朱家口相近。”

乾隆元年(1736)御制祭文:“江南宿迁县之皂河庙祀显佑通济昭灵效顺黄河之神由来久矣。……而祠宇岁久日圯,弗称祀典,爰允河臣之请,特发帑金鼎新神庙,经始于雍正五年五月内,落成于是年十一月。”此后皂河龙王庙正式被列入国家祀典,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五次取道皂河诣庙拈香祭祀,且每次都赋诗一首。由此可见,清朝最高统治者对皂河龙王庙之重视。

弘仁普济天妃

天妃,也称天后、天后圣母,闽、粤、



张闻涛 / 摄

台一带呼为妈祖,民间俗称海神娘娘。这是我国沿海地区从南到北都崇信的一位与水有关的女性神灵。天妃本名林默,福建莆田湄洲人,相传她不仅能保佑航海捕鱼之人的平安,而且还兼有送子娘娘的职能。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敕封她为灵惠夫人,后又进封为灵惠妃。元代因倚重海运,故官方和民间都进一步尊崇此神,极其重视对天妃的祭祀。明初郑和下西洋,也极为重视对天妃的崇祀,永乐七年(1409)加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加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年间先后十余次对其加封,至同治十一年(1872),天后的封号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

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天后”,达64字之多。

淮安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明清时期的淮安是黄河、淮河、运河的交汇处,为商旅必经的咽喉要道。永乐年间(1403~1424)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后,淮安因其处于南北咽喉,成为重要的漕运枢纽。光绪《淮安府志》记载漕运兴盛时的淮安“秋夏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车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数量众多的官员、漕军、客商、船工、水手云集淮安,在淮安黄运沿岸建立起众多祭祀各种水神的庙宇和祠堂,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祭祀要求,其中就有专门祭祀天妃的祠庙。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记载当时山阳县境内的天后宫在“城西南隅,宋嘉定间安抚使贾

涉建，国朝康熙中漕督施世纶重修。又一庙在察院西，一在新城大北门内”。明代淮安府城天妃庙称灵慈宫，永乐年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在其《敕赐灵慈碑记》中记载：“永乐初，平江伯陈瑄奉命率舟师，道海运北京，然道险所致无几。……遂作祠于淮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盖公素所持敬者。凡准人及四方公私之人有祈于祠下，亦皆响应。守臣以闻，赐祠额曰‘灵慈宫’，命有司岁有春秋祭祀。”清河县天妃庙叫惠济祠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乾隆皇帝首次南巡，视察惠济闸和高家堰石堤河工，并瞻谒惠济祠，命重加焕饰。同年六月撰写《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文》，碑文曰：“清江浦之浹，神祠曰惠济，鼎新于雍正二年，灵贶孔时，孚应若响，过祠下者，奠醴荐牢，靡敢弗肃。乾隆十有六年，朕巡省南服，瞻谒庭宇，敬惟神功庥佑，宜崇报享。命有司焉鸠工加焕饰焉。”由此可见，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清口惠济祠的高度重视。

明清时期的徐州因黄运交汇，河工频繁，再加上福建商人在此活动，故天妃信仰也很盛行。同治《徐州府志》就记载徐州下辖的沛县竟有天妃行宫十处之多：“一在县治东关护城堤内，一在县东五里射箭台上，一在县东十里，一在县北三里吕母冢，一在县西北二十五里刘八店集，一在夏镇新河西岸，一在县西南戚山北，一在县东南十五里，一在县东南三十里里仁集，一在县北三十里庙道口”。宿迁县天妃庙称天后宫，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即福建会馆，在新盛街”。福建会馆里面奉祀天后，可见福建商人在明清时期天妃信仰传播中的作用。



镇漕通河晏公

晏公，名戍仔，江西临江府清江镇（今江西樟树）人，原本是江西地方性水神，明初因受到朝廷推崇而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水神。明清时期专门从事漕粮运输的军队被称为漕军，漕军不但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时还要面临漕船沉溺、漕粮漂没的风险。因晏公有保障行船安全的职能，故得到了众多漕运官兵的崇奉。康熙《通州志》记载通州晏公庙在州东关，明万历六年（1578）建。临清晏公庙有三处，一在会通河闸，一在新闸，一在南板闸。民国《阜宁县新志》记载阜宁县晏公庙在县治射河南岸海墙头，成化年间（1465~1487），邑人刘盛与侄刘翰同建。道光《重修仪征县志》记载仪征县晏公庙在巡检司西，洪武年间（1368~1398），尚书单安仁建。

道光《泰州志》记载泰州晏公庙有四处，一在千户所，一在经武桥，一在荻柴巷，一在北门外新桥。乾隆《镇江府志》记载镇江丹徒县境内晏公庙有三处，一在丹徒镇，明初敕封，一在江滨，一在小沙。杭州晏公庙“在武林门北夹城巷崇果寺内，……明洪武初改奉晏公，相传为水神，故军营漕运之所往往立庙”。■



千年浮沉大运河

撰文 | 周佳

唐代诗人胡曾描述大运河：“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这条贯通南北的运河曾被看作是民众的苦难、国家的祸端。千年之后，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四十六个世界遗产项目。朝代兴亡交替，大运河也在变幻莫测的历史中浮沉千年。

隋炀帝：因大运河而来的毁与誉

民间都说大运河是隋炀帝杨广开凿的，严格说来并非如此。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一段大运河是邗沟，开凿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吴王夫差为了与越国争霸，运输军队粮草而建。在以后的朝代中，封建帝王们出于政治、军事需要，

多有兴建运河，这为后来隋炀帝把运河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其实隋炀帝开通运河也不是自己一拍脑门想出来的，而是继承父辈遗志。

隋统一中国后，定都大兴城（今西安），当时中国经济是关中贫瘠、江南富庶，而政治中心依旧在西部。不管谁当皇帝，要解决这个问题都只能是利用水路，把钱粮从南方运到西北。隋文帝杨坚就是这样做的，他挖通了从大兴城到潼关的广通渠（隋炀帝继位后由于名字避讳改称为永通渠），并对古邗沟进行了修浚。

到了他的儿子隋炀帝即位后，子承父业，继续兢兢业业地从事大运河开凿工作。不过隋炀帝的魄力和野心绝对比他的父亲大得多！他



相继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邗沟，还修浚了江南运河。形成了以洛阳为起点，又以北京和杭州分别为北方和南方的终点，全长2700公里的南北运河，即隋唐大运河。

因为这条大运河，有人把隋炀帝当成暴君，也有人说他祸害了当世，却造福了后世，褒贬不一，这都是有缘由的。

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挖掘运河全靠人工完成，修河是民工的一部血泪史。相传，隋炀帝派遣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征天下15岁以上的丁男，共征发了360万人。同时还采用5家抽1人的方法，负责民工的后勤保障。他还派了5万名彪形大汉，各执刑杖督工。由于劳动强度大，又严刑苛责，不到1年，360万民工竟死了250余万人。这条人命都记在了隋炀帝头上，让他

甚至有超过天下第一暴君秦始皇的势头。

而相传隋炀帝修运河的目的，更是让人觉得他堪称暴君、昏君，竟是为了去扬州看琼花！公平地讲，隋炀帝的确喜欢游乐，在位14年，出外巡行不下10次，但他并不是为了看区区琼花就会要250万条人命的昏君。589年，他才20岁，就当统帅灭南陈，之后平定江南叛乱，北上击破突厥，屡有战功。他也有文采，写一手好诗，《全隋诗》里现在还有他的诗作40多首。35岁登基时，光从年号“大业”就能看出他的雄心壮志。开凿大运河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就是为了调配物资，巩固政权之用。只可惜隋炀帝只懂得建功，不懂得惜力。他自己精力充沛地惊人，便以为天下没什么办不成的事，整个国家却跟不上他的节奏。民力不堪，隋炀帝还火急火燎地搞“大业”，又是东征高句丽，又是巡游显摆。也难怪百姓恨他入骨。

在历史上的众说纷纭中，唐代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算是对隋炀帝作了一个中肯的评价：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

张择端：画出大宋王朝的生命线

大运河贯通南北，流经今京、津、陕、豫、冀、鲁、皖、苏、浙9省市，沿线交通便利的地方，往往能聚集相当数量的人口和物质，于是，一系列“运河城市”应运而生。隋唐时期的汴州、扬州、苏州，明清时期的济宁、淮安、镇江等，都是水陆交通的枢纽，皆因河而兴！从宋朝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便可见当时城市经济的繁华。

传说张择端年轻时，专门靠为寺庙绘画而谋生，尤其擅长画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因为画得好，有了名气，汴京相国寺便把他请到寺中，包吃包住，好让他为自家墙上添几笔香墨。

一天，宋徽宗赵佶前去相国寺上香，听说才华横溢的张择端住在寺中。因为皇帝本人也是绘画高手，就来了兴致，亲自命题，让他画一幅能表现北宋汴京繁华盛景的图。张择端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提出条件，说不能把他关在皇宫，要找一个安静的农舍作画。宋徽宗同意了。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终于创作出了《清明上河图》。宋徽宗见此画后大喜过望，把画收入皇宫。北宋灭亡后，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掳到北方，藏于北宋皇宫的《清明上河图》也被金兵掠走。为了让在杭州称帝的宋高宗赵构不忘国耻，张择端闭门谢客，呕心沥血，重新绘制了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于宋高宗。而宋高宗却压根对画不感兴趣，直接把画退给了张择端。张择端看到画作被退，而高宗丝毫没有理解自己的隐喻，心绪难平，一气之下，将画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发现抢出了一半。这位忧国忧民的画家此后不久便忧郁而死，令人唏嘘不已。说回到《清明上河图》，它所描绘的虽然只是宋代汴京一个节假日——清明节的热闹场景，却展示了运河对宋王朝的影响力。

当时的汴京，城里流贯着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与广济河，都可做漕运。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每年光从南方运到汴京的米，就有600万石，更不要说布帛、茶叶等其它朝廷用度。因此，在宋朝人眼中，大运河称得上是北宋立国的生命线。宋神宗时期的宰相张方平

就说过：“汴河之于京师，乃建国之本。”

这条生命线给北宋带来了与以往任何朝代都不一样的商业价值。宋朝以前，大宗长途贸易仅适用于丝帛、茶叶这类轻巧之物，商人们默守“千里不贩籩”的习惯。大运河却让粮食长途交易成为可能，于是商人们从江淮把贱市粳稻转运京师，从中狠赚一笔，甚至很多朝廷官员都垂涎于经商。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沿着河岸，商铺、酒楼、茶坊鳞次栉比，连桥的旁边也摆满小摊。北宋的“河岸经济”遍布整条水系，在《宋史》中能找到的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三分之一都位于运河沿岸。这些市镇不同于传统的农业、行政构建城市，完全是随运河而生的工商业、制造业、运输中心。正因如此，才有很多海外学者把宋代视为中国历史的分界线。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就曾说过：“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

潘清：漕帮与大运河的衰退

很多人也许都会畅想，要是中国能沿着宋代的工商业之路往下发展，现在会是什么样。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大运河维系了明清两朝的命脉，也躲不过被历史抛弃的命！

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运河经山东直接南下，不再取道洛阳，航程大大缩短。全长只有1794公里，史称京杭大运河。而明、清两代能够立国并定都北京，皆仰赖大运河的漕运，正所谓“天下大命，系此一河”。当时中央设置了专门的漕运总督府，总督为正二品，由皇帝钦点，足见王朝对漕运的重视。

明朝永乐年间，建立了职业性的“漕军”

负责漕运，但政府给予的待遇很差，在运输过程中又时常会出现翻船、漕米受潮、官吏盘剥等情况，军户就算安稳把货物运到目的地，说不定会被拉去当替罪羊，因此大量逃亡。政府不得不雇佣无业游民，充当船工水手。明朝中后期，负责漕运的船工水手中已有一半来自政府雇佣。至康熙中期，一只漕船上额定的 10 名水手中，除了一名负责人是有军籍的运军外，剩下 9 个都是“临时工”。舵工、水手、纤夫等聚集在一起，人数庞大，构成了在大运河上讨生活的一个特殊群体——漕帮。

漕帮因漕运而生，地位却一直很尴尬，说是“工会”，没啥名分；说是黑帮，做的却是正当差事。因此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直到雍正初年，才为世人所知。

雍正皇帝重视农业，广设粮仓。登基没多久，便派钦差大臣田文镜放出皇榜，招揽能人志士兴办漕运。

当时杭州有 3 个拜把子兄弟，翁岩、钱坚和潘清，揭了皇榜，向田文镜叙述整顿漕运的办法。田文镜一听，觉得他们有点能耐，便向皇帝汇报。三兄弟还提出，要统一粮务，就得开帮授徒，皇帝也批准了，于是漕帮从地下转为地上，三兄弟被奉为漕帮“三祖”。

翁岩是江苏常熟人，秀才出身，后弃文习武，在少林寺学过功夫；钱坚本是山东人，后迁居河南，走南闯北经商；潘清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三人创立漕帮后，翁岩收徒弟 8 人，合“八仙”之数；钱坚收徒弟 28 人，合 28 星宿之数；潘清收徒弟 36 人，合 36 天罡之数。3 人共收 72 人，象征 72 地煞。

漕帮成立不久，翁、钱二人便先后去世，

潘清一个人挑大梁。他劝诫帮众修德论道，将一帮市井船夫治理得有条不紊。帮中大小都以字辈论，凡入帮者，不论何姓，一旦入帮，均为潘家子孙，俨然一个大家族。

原本漕船上，从负责押运的小武官到水手、纤夫，人可欺凌。漕帮壮大后，人多、船多、势力广、声势大，一旦漕帮不动，各省百姓的吃喝、年粮、军饷，马上就会不继。所以，各地官府甚至朝廷，都不敢轻看漕帮，漕帮盛极一时。

自然，有漕运才有漕帮。晚清道光年间，一方面“运河淤阻”，一方面“江淮烽燧”，英军不满清廷禁烟，把战火从东南沿海一路烧到了江南，上海、镇江失守，京杭大运河被拦腰截断。这对清廷来说，无疑是被切了大动脉，只能与英军签订《南京条约》。

只是，一纸和约、百万赔款也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英国这尊大神还没送利落，洪天王又带着太平军大动干戈，南京、扬州、苏州一路战火，运河更是不能正常转运。再后来，“洋务运动”开始，清廷有了现代轮船，北方运粮皆走海路，1901 年，漕运完全停止，延续千年的大运河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漕帮倒是延续下来，成为了青帮。帮众们弃水登陆，向上海和运河沿线城市发展。只是这些水手、舵工们，除了在运河上讨生活外没有一技之长，大多数人逞勇斗狠，成为地方一霸。清末民国，上海滩那些烜赫无比的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青帮中人。直到现在，青帮在台湾仍有社团。

历史上，大运河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荣作出巨大贡献，虽几经沉浮，命脉却始终得以延续。而申遗成功，又让历经千年浮沉的大运河有了新的开始。■

运河遗存

CANAL PELIC



明代北新关
清代苏州府官斛



一、北新关设置的原因

1. 明初杭州经济的繁荣

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浙地区日趋繁荣。杭州自隋代以来，成为大运河的终点，便利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杭州一跃成为万物富庶的“东南第一州”。南宋定都杭州之后，杭州更是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元代，杭州依旧延续了南宋以来的繁荣，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到明初，杭州“舟航水塞，车马路镇，百货之委，商贾贸迁”。^[1]是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浙之杭，百货攸萃，舟楫聚焉，故设关榷之”，^[2]杭州经济的繁荣成为北新关设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北新桥特殊的地理位置

钞关既然是征收过税的机构，必定设于交通枢纽。元末，张士诚占据杭州，在南宋已有河道的基础上疏浚而成新的运河，“自塘栖南五林港开河至江涨桥，因名新开运河，亦名北关河。”^[3]新开运河开通后，取代上塘河成为大运河的主干道，“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舟，皆由此达于行都”。^[4]明清时期，仍沿用了元末的北关河水道。北新桥正位于大运河主干道北关河上，它地处杭州城北，浙东运河、钱塘江、西湖、苕溪、余杭诸水结脉北新桥南，北新桥是杭州运河的中心。“路当吴楚闽粤之冲，水浮陆走者必由焉”，^[5]是进出杭州城的必经之地。再加上杭州“南通闽粤，西跨豫章，北连吴会”^[6]的区域位置，在北新桥设关不仅可以控制杭州的水陆运输，影响范围更可波及周边省份。

3. 推行宝钞政策的需要

明初，朝廷发行大明宝钞，以强制手段迫使官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是，由于滥发纸币，到宣德年间，宝钞贬值，通货膨胀严重，官民利益受损，民怨不断。明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基于此，明政府希望通过设立钞关，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史载：“宣德间，钞法不行，廷臣奏征天下官民客商船料钞。”^[7]推行宝钞政策的需要成为明政府设立钞关的重要引线。

二、北新关的设立

明宣德四年（1429年），北新关设立，隶属于户部。因设于北新桥，据



北新关

桥为关，称为北新关。又因明代以钞交税，称北新钞关。史载“宣德四年，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远近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于是，有灤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8]成化四年（1468年），北新关被废。成化七年（1471年）复设，此后成为定制。北新关设立之初，仅征收船料费，即运载商货船只的通过税。正德六年之后，兼收商税。和其它钞关不同的是，北新关分曹设口，各有专司。自北新关向东、南、西三处都有巡查口址。其管辖范围包括了拱宸桥直河一带、屠子桥、郭家浜、丸窑头、谢村二桥至王家庄，共计二十五里。此后石亭子也划入北新大关内。因此，北新关并非单一的据桥设关，而是包含了一定的管辖范围，在此范围内，皆可进行巡查。北新关下设七务六关。七务包括了城中务、江涨务、城北务、城南务、横塘临平务、西溪务、安溪镇凤口务。六关包括了东新关、打铁关、观音关、板桥关、良马关。原则上七务征收商税，六关征收船料费，各有分工。并根据货物多少确定在北新大关交税还是在七务交税。北新关以大关为中心，和分布于不同区域的七务六关相结合，形成了统一的整体，也由此得以控制杭州各水路商品流通的情况。

三、北新关的设置与杭州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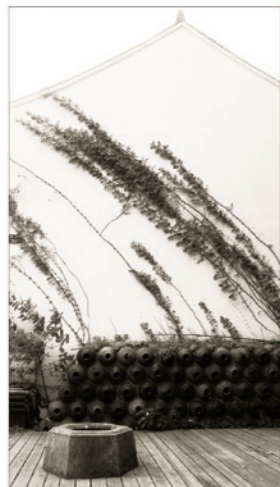
北新关设立后，江西、闽广、苏南等地的商贸更加依赖于大运河，许多货物都需要在杭州进行中转，也因此促进了杭州经济的发展。根据雍正《浙江通志》的记载，明代弘治元年北新关商税额 4000 两，嘉靖二十三年商税额 30000 两，万历三十九年 49700 两，到天启元年商税额达到 69700 两。^[9]从北新关的税收变化中足可见杭州经济在明代的发展。此外，北新关设置后对杭州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市镇的繁荣。城内市集繁华，城外市镇也飞速发展。最著名的市镇当属北关和湖墅两市。

1. 北关市

北新关设立后，由于处于大运河主干道以及商税征收的需要，这里成为进出杭州的必经之路，沿运河过来的商品都要在此集散。在其附近形成了热闹非凡的商业贸易区，“百货辐辏，商贾云集，千艘万舳，往回不绝，东南财赋之乡，此其征也”。^[10]并且形成了著名的北关夜市。夜市实际上是白天商贸活动的延续和补充，是城市经济高度发展的标志。明代中叶，杭州商业已十分繁荣，外地商贾纷纷涌入杭州，白天的商贸已不足以满足商贸活动的需要。特别是北新关一带，因杭州城的粮食以及丝绸竹木等货物都需要大运河来运输，每天都有千百艘的商船经过北新关，日夜不停，货物运输十分繁忙，北新关一带成为丝绸、棉布等众多货物的集散地，加之处于杭州城外，商贸活动不受时间限制，遂形成了以商业活动为特征的夜市。明人高得旸在《北关夜市》一诗中描绘道：北关晚集市如林，上国流传直至今，青苎受风摇月影，绛纱笼火照春明。楼前饮伴联游袂，湖上归人散醉襟，阗阗喧阗如昼日，禁钟未动夜将深。^[11]由此可见北关夜市商业之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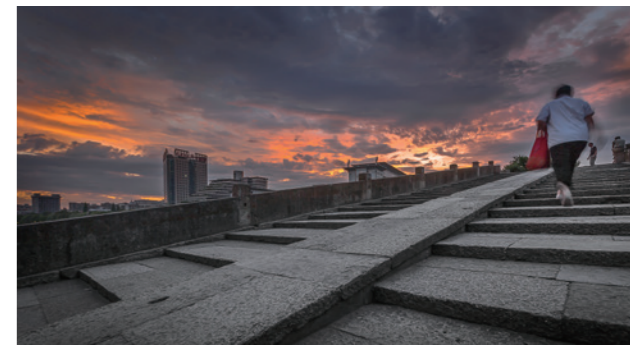
2. 湖墅市

湖墅，在明代也称湖州市。地理范围涵盖武林门到北新关。杭州自南宋以来形成了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城市格局。明代，由于杭州及周边商业的发展，杭州城所需粮食更多的依赖外地输入，湖广地区是其主要来源之一，大量的粮食经长江转入京杭大运河，从城北运往杭州城。由于湖墅地区毗邻北新关，境内又有京杭大运河、上塘河、余杭塘河，交通发达。大量的粮食在这里集散。湖墅地区成为杭州米粮集散中心。同时杭州的丝绸、茶叶以及周边湖州、嘉兴等地的特产、货物等也是在湖墅地区中转再经运河销往北方各地的，这里是杭州重要的商业区。顾炎武这样描述湖墅的繁荣“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中居民也。……而河北郡邑乃有数十里无聚落，即一邑之众，



北新关边上古建筑

尚不及杭城南北市驿之半者。”^[12]认为湖墅已经超过北方一个州郡的规模。而明人陆玄锡“湖墅地方十余里，而民居稠密，市舶彘集，一大都会也。”^[13]也说明了借助于大运河与北新关，湖墅地区依据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带来了辖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张闻涛 / 摄

结语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全国商贸流通愈加依赖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不仅是明代南北经济大动脉，更维系着明王朝的生命线。而钞关正是明政府在运河沿岸及水陆要冲设置的重要关卡。终明一代，全国共有八大钞关，七个设在运河沿线，杭州的北新关便是其中之一，地位可见一斑。北新关的设置及之后的快速发展除了杭州位于运河终点的区位因素外，更与杭州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反之，北新关在设置后，杭州运河征税系统更加完备，运河的管理也愈加规范，提升了杭州在运河沿线及周边城市中的地位，推动了杭州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三《城池》。
- [2] 孙忠焕：《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 [3] [清]李卫等编：雍正《浙江通志》卷五三《水利》，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版。
- [4] 咸淳《临安志》卷三五《山川》·《新开运河条》。
- [5] 孙忠焕：《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 [6] 孙忠焕：《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页。
- [7] 万历《淮安府志》卷三《建制志·公署》。
- [8]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一《志五十七·食货志·商税》。
- [9] [清]李卫等编：雍正《浙江通志》卷八六《榷税》，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版。
- [10] 孙忠焕：《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 [11] 《西湖游览志余》卷一二《才情雅致》。
- [12] 顾炎武：《肇域志·浙江》。
- [13] 孙忠焕：《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在运河博物馆运河漕运的展区里，有一件不起眼的文物：口子小、底下大的台状造型使得它看起来有些笨重，木质的器身因为年代久远早已分辨不出原有的颜色，两侧辅助的抬杆也蒙上了薄薄一层灰，唯有器身上留下的工整字迹仿佛诉说它曾经厚重的历史。这件文物就是清代苏州府官斛。

器之源

斛，属于我国古代度量（重量）量具（容量）衡具（长度）中量具的一种，常用于称量谷物，和成语“升斗小民”里的“升”、“斗”一起，组成一整套大中小量程的量取器具。

与我们今天买米买面按斤论的情形不同，在古代，粮食大多以容量来算。因为在早年度量衡的制度制定之初，就是以人们自己的身体来做依据的。

“一手之盛谓之掬，两手谓之溢”，说的就是以一手所能盛的叫做“溢”，两手合盛的叫做“掬”。“掬”是最早的基本容量单位。而《小尔雅·广量》有“掬四谓之豆”，《左传·昭公三年》说“四升为豆”，可见掬与升是相通的同一级别单位，十升即为一斗，五斗等于一斛，两斛并做一石（早期“斛”即是“石”，南宋末年改五斗为一斛）。所谓官斛，就是由官家统一制作发放，是那个年代的标准量具。

那么，粮食为什么要以容量来计算呢？

食为天

中国是农业大国，粮食的功能不仅仅是解决温饱的食物，在封建社会时期，粮食更是维系国家命运的主要税赋：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民食调剂，可见“民以食为天”，吃饱是众生平等的头等大事。

然而，地区与地区之间产粮并不平均，一句“苏湖熟，天下足”让我们可以想见当年长途跋涉转运大批量粮食的现象，而在这个过程中以固定容量做单位计算比起用秤称量就会方便得多，也现实得多。

另一方面，谷物受潮会大大影响自身重量，如若以容量计量便可以很好地避开这个问题。

漕之歌

在古代中国，四通八达的水路是较陆路更加便捷的交通形式。而这一便利也促成了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种经济制度：漕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

从漕粮征收、装船运输再到地方存储、开仓发放，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核实数量，“起米过斛”印证的就是漕粮称量的频繁。将谷物倒进斛里，装满便记作一斛。因此，“斛”不仅是实用的量具，也是计量的单位。

既是朝廷发下来的“官斛”，就是代表着官方统一的标准。在这件苏



苏州府官斛



官斛侧面



筒形官斛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

州府官斛的一个侧面上，我们依然可以辨认出当年刻着的“奉院司道仰府较同”的字样，意思即是通过了市一级的院、司、道、仰四个部委校正认同。

除此以外，官斛的制作和使用也的确有着一套严格的标准。首先，这官斛的每一面都由一块完整的木板制成，以保证内外平整、整体牢固。其次，官斛的使用还需要配合一块刮板，用来刮平斛口上的谷物，以此实现公平公正的量取结果。

然而，贪婪的欲望总能驱使人想出些见不得光的小聪明。由于官斛是木头制作的，当斛的内壁被削薄一层，从外观上很难发现。也有的斛头发现木板容易变形，就用铁棍撑在斛里，一段时间下来，斛就被撑大了一圈，这两个方法都改变了解原有的容量。而看似公平公正的刮板也另有门道。这刮板被偷偷做成微微的月牙形。当斛头们开始征收粮食的时候，他们将月牙背向自己，这样一刮，谷物的中间就会高出斛面一些；而发放粮食的时候，又把刮板翻个个儿，于是刮出的面就成了凹形……

一斛可以多盘剥两到三升，在经过千千万万斛的称量后，数量就大得惊人了！

不可否认的是，在历史上，称量用的官斛几经改革。据记载，秦汉时期的斛是上下一样大小的桶形；而到了宋末元初，斛的造型已经改为上小下大，这样一来，就算有人在官斛上作弊，相差就不至于太大；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朝廷专门制作了铁皮官斛用于校准。然而如此种种依然治标不治本，晚清时期，漕弊俨然成为与盐政、鸦片并列的三大毒瘤！

试问聪明如我古人，竟会解决不了这其中的问题？

漕运在中国古代沿用了两千多年，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下，制度与弊端这对相生相克的矛盾，也伴随着运河漕运一直存在。解决问题并不难，难的是不愿。

1901年，光绪皇帝下旨以银两折合成漕粮，失去了作用的官斛大多被砸成为生火用的材料，而官斛上的秘密和那不愿解决的难题终于成为历史话题。

今天，当我们在展柜里重见这些幸免于难的官斛时，很少会有人关注它，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早已将用秤称米、用壶装油习以为常，官斛，只不过是代又一代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中的一个缩影。■



八面来风

INFORMATIVE



清风涤尘 利剑惩腐

运河颂红船·书画忆长征

新书《天堂流过一条河》举行首发仪式

《遇见大运河》从杭州舞到北京

纪录片《国之大运》正式启动

北京大运河临时邮局亮相什刹海畔

扬州开通京杭大运河旅游专线

380多岁的拱宸桥，启动首次水下体检

巴拿马运河扩建后通航

喜迎G20 文明我先行

廉政情景剧《清风利剑》「七一」首演
清风涤尘 利剑惩腐

“七·一”建党95周年之际，一场别具特色的廉政情景剧《清风利剑》在胜利剧院“舞起利剑扬清风”！

这部由拱墅区纪委、拱墅区文广新局和杭州哈哈艺术团共同打造的廉政情景剧，7月1日下午在胜利剧院进行正式首演，献礼建党95周年，全区700余名党员干部观看了首场演出。

“反腐倡廉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关百姓切身利益，一直是社会关心关注的热点话题。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强势推进反腐工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查处了一大批损害群众利益的大案要案。作为文化部门，如何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把中央的反腐倡廉工作展现好，宣传好，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拱墅区文广新局党委书记、局长黄玲说，“以情景短剧的艺术风格来体现反腐倡廉的主题，这在艺术创作上也是一种创新，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得到了纪委领导的大力支持。然而剧本策划，困难重重，一是反腐倡廉主题用情景剧的形式表现，在近十年的杭州文艺舞台上是不曾有过的，也可以说是首创、原创，很难有借鉴参考的实例；二是主创人员都没有纪委的工作经验，在题材的选择与度的把握上有一定难度。



拱墅区区委书记许明在首演上讲话 拱墅区纪委书记洪晓明在首演上讲话

为了让剧本更真实生动，区纪委的纪检干部、区文广新局的文化干部多次给主创人员进行培训指导，通过文件学习、座谈、案例分析、刊物阅览等方式，让主创人员明白理念、掌握内容、拓展创作思路。随后排演的过程也是非常艰辛，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每一句台词甚至语音语调都经过反复琢磨。为了达到好的演出效果，所有演员都参加全封闭式的排练，吃住都在一起。”

经过反复修改，反复论证，反复演练，《清风利剑》首演取得圆满成功。



运河颂红船·书画忆长征

拱墅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诗·书·画交流活动



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拱墅区举办了题为“运河颂红船·书画忆长征”的诗·书·画交流活动，以诗歌朗诵、节目演出、书画展示等艺术形式，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光辉岁月和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以实际行动向建党9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

活动在拱墅区文广新局“七·一”表彰大会中拉开帷幕，表彰了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颁发优秀共产党员及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证书。

接着，诗歌朗诵会将活动引入高潮，诗歌朗诵《长征》、《对一片日历的怀念》、《想起你，总在刹那间》、《中国的火焰要向西北流动》等诗词，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奋力开创美好生活的辉煌历程和伟大功绩，抒发了拱墅人民对党的无限忠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活动的中场为歌唱活动，由蓓蕾幼儿园带来的童声合唱《祖国，祖国，我们爱你》，唱出了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小提琴独奏《我和我的祖国》以及由拱墅区首个机关干部成立的韵河合唱团为大家献唱了《党啊，亲爱的妈妈》，唱出了对祖国和党的满腔热爱。

活动的最后是书画展示，集中展示30余幅主题明确、格调高雅、健康向上的作品。活动现场邀请书画名家及辖区书画爱好者代表，进行现场书画创作交流。

本次活动由拱墅区文广新局主办，拱墅区文化馆、拱墅区图书馆、黄亚洲工作室、太炎国学书画院承办，华语之声传媒协办。



新书《天堂流过一条河》举行首发仪式



6月8日，在拱墅区“文化遗产日”的开幕式上，举行了《天堂流过一条河》新书首发仪式。

该书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报告文学作家孙侃先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会，真实记录了近十余年来拱墅区大力保护和弘扬运河文化，建设运河文化带的实践及成果、展现了拱墅城市转型和文化事业面貌的新变化。全书分上篇《一条大河入梦来》、中篇《我家就在河边住》、下篇《运河之美爱不完》三个篇章。

作者孙侃先生说：“拱墅和我本人有不解之缘，我在杭州生活几十年，基本都和拱墅、运河有关，从半山到大关附近，到左家新村，再密渡桥，这一路下来都和运河有关，所以我经常在运河边走过，是运河变化的见证人。这也是这本书创作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我对这条河爱得很深，对拱墅也有很深的感情。”



《遇见大运河》从杭州舞到北京

6月11日，是我国第11个“文化遗产日”。作为国内唯一的文化遗产传播剧，杭州歌剧舞剧院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昨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完成了自己历经两年沿中国大运河六省两市96场的巡演历程。

杭州歌剧舞剧院院长崔巍，曾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中心执行副总导演，她创作的《阿姐鼓》曾开创国内舞蹈诗剧的先河。时隔6年，崔巍携手2008年奥运会《阿姐鼓》主创再担重任，完成《遇见大运河》的打造，并邀请曾为《加勒比海盗》、《珍珠港》等影片作曲的好莱坞作曲家克劳斯·巴德尔特，以多元文化视野解读中国民族文化特征，创作出交融共通的史诗般旋律。

北京是《遇见大运河》国内巡演的最后一站，两年来每到一个地方都成为当地的热点和话题，昨晚的演出同样赢得了北京观众的赞赏，其中的秘诀不仅在于作品本身质量高，还特别“接地气”地加入了京杭大运河的起始端北京通州元素，为此杭州歌剧舞剧院的演员们在紧张的彩排中，抽出半天时间，来到通州采风，在通州新城北运河两侧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中感受北运河的厚重历史文化。

崔巍透露，这样的“随演随改”一直贯穿于《遇见大运河》的巡演过程中，“运河沿岸的城市对运河文化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有城市创排了自己的运河题材作品，但是《遇见大运河》所到之地从没有遭遇‘地方保护主义’，因为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融入当地的人文风情，不生硬不流于表面，有时改动部分能占全剧的2/5，甚至邀请当地的剧团一起演出，这样入乡随俗的做法得到当地观众的高度认可。”虽然对于主创和演员工作量非常大，但是崔巍坚定地认为大运河是属于所有人的，保护大运河也是每个人的责任。

据悉，明年《遇见大运河》将赴法国参加中法文化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汇报。同时，该剧已获得亚、非、欧多个运河文化深厚的国家邀请，相关出访工作正在积极筹备中。

（摘自《北京晚报》，6月13日）



纪录片《国之大运》正式启动

撰文 | 阮妍妍 凌怡

正值大运河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由拱墅区委、区政府与杭州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出资，央视丝路纪录片团队拍摄制作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国之大运》在拱宸书院举行启动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翁卫军出席。

大运河是至今仍然活着的“世界遗产”。处于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杭州，千百年来得到运河恩惠与滋养，运河边的诗意栖居成为今天杭州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今年9月，G20峰会将在杭州举行。讲好杭州故事，唱响“中国好声音”已经成为这一年最重要的大背景。《国之大运》纪录片拍摄正式启动，正可让杭州向世界借此展现其“历史和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

《国之大运》围绕“运河”与“命运”两个主题词展开叙事，整体结构分“长河”、“国脉”、“财富”、“文渊”、“奇思”、“今天”6集，以最专业的服装、道具、化妆、灯光、置景，结合三维动画技术，让大运河这幅纵贯南北的历史画卷重新“活”起来，让那些历史人物重新展现他们的生命风姿。该纪录片力争在大运河申遗四周年之际播出。

（摘自《杭州日报》，2016年6月13日）



张闻涛 / 摄



北京大运河

北京大运河临时邮局亮相什刹海畔



为庆祝“大运河”申遗成功两周年，保护大运河申遗成果，促进大运河集邮文化的普及，经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批准，北京大运河临时邮局6月22日正式落户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邮政支局。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运河，与万里长城同被列为中国古代两项最伟大的工程，201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作为元代大运河的北方漕运终点区域，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邮政支局的服务道界内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申遗成功的大运河北京段4个遗产点中，就有3个位于这一区域，且邮局办公楼紧邻大运河遗产区。

开业当天，临时邮局启用了“北京/大运河（临）”邮政日戳、“大运河遗产点——万宁桥”邮资机宣传戳、“庆祝大运河申遗成功两周年”和“大运河临时邮局开业纪念”宣传戳，发售了纪念封、纪念邮折等邮品。此外，邮局还与北京市西城区集邮协会、京城大运河集邮研究会联合举办了“庆祝大运河申遗成功两周年”集邮展览。



扬州开通京杭大运河旅游专线

6月17日11时许，京杭大运河首艘豪华游轮“运河名城1号”满载120多名中外游客安全快捷地通过邵伯船闸。

为了让人们近距离了解大运河，参观浏览大运河活态文化遗产点，江苏扬州开通了京杭大运河“扬州—邵伯—高邮”水上旅游专线，这条线路串起了茱萸湾、凤凰岛、邵伯古镇、高邮孟城驿等景区景点，集中了历史文化、生态景观、名镇风采、休闲美食等旅游资源，全程约45公里。

该游轮从扬州始发，终点高邮镇国寺，途经大运河上的邵伯船闸，邵伯船闸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中外游客。

据了解，邵伯船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邵伯船闸民国时期进行建造，作为当时建设的先进船闸，采用钢板桩钢筋混凝土浇筑，闸门启用机械均由英国进口。



张闻涛 / 摄

380 多岁的拱宸桥，启动首次水下体检

撰文 | 孙晶晶

杭州拱宸桥，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至今已有380多年。早前由于桥墩屡屡被撞，对拱宸桥的保护，杭州这几年一直没松懈过。

2005年，相关部门在拱宸桥主桥墩两侧修建了四个防撞水泥墩，并在每个水泥墩上放了传说中能镇河妖防洪水的石雕趴蝮（bā xià，一种神兽）。

本周，拱宸桥又启动了有史以来的首次“水下体检”，对拱宸桥的

木桩基础进行一次全方位检测，采集各种DNA信息。

拱宸桥位于杭州市区大关桥之北，东连丽水路、台州路，西接桥弄街，连小河路，是杭城古桥中最长、最高、单跨最宽的薄墩连拱石桥。

这座古桥，曾是古运河杭州终点的标志。许多回乡游子看到这座桥，就知道快到家了。如今，这里也是运河边最热闹的区域。

为什么要给拱宸桥做这次“水下体检”？杭州市城管委市政设施监管中心桥隧科副科长陈斌介绍，由于拱宸桥所属的运河段过往船只较多，近几年随着内河水运的发展，船的吨级越来越大，而拱宸桥方孔只允许单向通航，很多船舶和拱宸桥几乎是“擦身而过”。

今年3月，拱宸桥防撞墩工程顺利完工，为拱宸桥的防撞加了一道“保险”。但因检测条件困难，拱宸桥水下木桩基础却一直是个谜。

“特别是经受百年水流冲刷、风化腐蚀后的木桩基础是否能满足上部承载要求，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而一旦木桩基础失稳或破坏，对桥梁损害是毁灭性的。这次体检就是想探明拱宸桥的水下木桩基础是否还安全。”

据悉，这次水下体检采用的都是无损检测手段，采集拱宸桥的各种DNA数据。

“我们先用多波束测深仪测量桥底及两侧各100米范围内的河底地形。然后用侧扫声纳仪，扫描桥底及两侧各100米范围内的河底底质与水底障碍物，了解出露河底的木桩和条石基础外观。这样，结合这两方面的数据，基本就可以分析出水下基础冲刷情况。”

另外，还会对拱宸桥进行声波CT扫描检测，采集木桩的深度及分布信息。

当然，想要全面了解拱宸桥的水下木桩基础，还得进行一次实地踏勘。所以，这次还专门找了“蛙人”（潜水员）帮忙，携带浑水摄像机摄录出露河底的水下基础，对条石基础以及露出的木桩进行外观检查，并用尺子对一些数据进行校核。

等体检结束后，专家会对数据比对分析，依结果，对拱宸桥开展进一步保护。

（摘自《钱江晚报》，2016-06-25）



巴拿马运河扩建后通航

巴拿马在6月26日举行隆重庆典，庆祝巴拿马运河扩建后正式通航。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旗下的“中远海运巴拿马”号成为巴拿马运河扩建后首航船只。

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8月15日通航，总长约81公里，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素有“世界桥梁”的美誉。

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始于2007年9月。运河扩建后能够通过的最大集装箱船的运力在1.3万标准箱左右，是过去的两倍多，运河的货物年通过量也有望从现在的3亿吨增加到6亿吨。

中国驻巴拿马贸易发展办事处代表王卫华表示，中国与巴拿马早因运河结缘。从挖掘巴拿马运河开始，华人一直参与其中，甚至为运河工程献出生命。巴拿马运河扩建中，8扇巨型新船闸闸门就是由中远海运集团运输至巴拿马。



喜迎G20 文明我先行

运博开展文化志愿者服务培训

为迎接G20峰会在杭州召开，讲好中国故事，弘扬运河文化，展现运河的独特魅力，6月19日，运河博物馆组织文化志愿者们开展了文明服务培训活动。

本次培训分为了三个环节，从基本志愿者服务理念熏陶，到日常英语速成口语练习，再到博物馆展厅讲解技巧的传授，给志愿者们带来一堂切实有用的培训课程。

随着G20的到来，各国的友人将来到杭州，为了一尽地主之谊，先要学会沟通，从“你好”是“哈喽”、“嗨”开始，志愿者们一边跟着博物馆专程请来的英语老师学着口型，一边还不停地用手比划着。之后，老师还设计了一些问路、找洗手间等常用的情景对话。在讲台演练后，逐句分析，大家学得不亦乐乎。



运河文化公益促进会成立以来，招募了近千名来自社会各界的文化志愿者，其中不乏专业人士。博物馆也利用促进会的专业老师资源，以志愿者辅导志愿者的形式，开展多项培训。这次请了文博队资深志愿者肖宁老师，为新招募的志愿者们介绍了博物馆的展陈基本情况，以及在今后讲解中需要注意的细节一一做了说明，志愿者们认真跟着学习。最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志愿者们在博物馆展厅实地演练，争取为观众提供最好的服务。

剑瓷视界艺术馆

杭州剑瓷视界艺术馆是国内首家龙泉宝剑、龙泉青瓷主题艺术馆。它坐落于风景秀丽、古色古香的大兜路历史街区，门临佛缘圣地香积寺，背依世界遗产大运河，可流连运河之美，可参香积梵音，可鉴赏剑风瓷韵，可品茗识香。是杭州一处难得的避世修心休闲之所在。



剑与瓷、一阴一阳，一文一武，一刚一柔，自然地符合了阴阳文化天地之道也，正是自然界阴阳的和谐与统一。剑瓷视界艺术馆以推广龙泉青瓷、龙泉宝剑文化为己任，传承千年技艺，弘扬剑瓷文化。在这里您可以面对面观赏电影《建党伟业》、《王的盛宴》、《秦时明月—龙腾万里》等电影大片中的青瓷、宝剑道具，深度了解到千年的龙泉青瓷和龙泉宝剑的制作技艺过程；在这里您也可以欣赏到大师的名家作品，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大师的创作，深刻地感悟剑瓷文化之美妙；在这里您还可以抚琴焚

香，感受古人的生活乐趣，让平日的压力和紧张可以得到最好的释放与舒展。

剑瓷视界艺术馆以文化参观展示和教学体验为一体，服务内容包含龙泉青瓷、宝剑高端文化礼品定制，精品展销，中国传统文化公益讲堂、中国传统香文化表演、体验，中国传统茶文化表演、体验，青瓷陶艺DIY制作、青瓷饰品DIY制作，古筝、古琴表演与教学，传统文化与沙画结合教学、体验等。

